

國立台灣大學社會科學院政治學系

碩士論文

Department of Political Science

College of Social Science

National Taiwan University

Master Thesis

中國與東協國家區域整合的政治經濟分析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States



張之豪

Chang, Chih-Hao Harry

指導教授：蕭全政博士

Advisor: Shiau, Chyuan-Jenq Ph.D.

中國民國九十七年七月

July, 2008

國立臺灣大學碩士學位論文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中國與東協國家區域整合的政治經濟分析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Regional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ASEAN stat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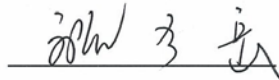
本論文係張之豪君（學號：R93322043）在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系完成之碩士學位論文，於民國 97 年 7 月 18 日承下列考試委員審查通過及口試及格，特此證明

口試委員：



（簽名）

（指導教授）



轉眼之間，回來臺灣已經這麼久，最感謝的人莫過是辛勤為我付出並忍受我散仙個性的父親張耀武先生與母親游美婉女士，還有姊姊張之臻，是他們讓我衣食無缺，並總在我最脆弱的時候，給予我任何事物都無法替代的愛與溫暖。同時這段時間若沒有 天上聖母媽祖與 地藏王菩薩的加持與保佑，弟子也難平安渡過，感恩無限。

自從踏入社科院的教室裡，一聽到恩師蕭全政博士不厭其煩地解釋著主觀與客觀，兩種社會科學典範的差異時，我明白了在這條路上的方向。也因為蕭恩師的寬容與教誨，讓這本論文得以完成。蕭恩師所給予的不僅是知識的傳授，更是智慧的啟發，而將兩者主客合一的浩大工程，將會是我一生所追尋的目標。也感謝張五岳博士與陶儀芬博士兩位口試委員給予我最嚴厲的鞭策與指教。

沛憶，在論文寫作的這段時間，還有接下來漫長的人生，都是因為妳，我才得以幸福與快樂。

感謝阿菊小姐、Gentle 先生與 Lady 小姐、濁水溪社的大家：士博、東諺、冠和、建宇、昕璋、房蒲、允中、俊翔、勝涵、崇任、家慶、紹唐、于倫、維昭、聖芬、若含、雅薇、冠妘、靜慧，謝謝你們陪我努力，為我打氣，能與你們鬥陣作伙是我的榮幸，也祝福你們人生的道路一切順利。感謝曾經陪伴我渡過好日子與壞日子的芳庭、于琿，感謝。

男四 418 的兄弟們國鈞與承欣，如果沒有你們，那無數個漫漫長夜不知道該怎麼過下去，謝謝你們的陪伴與源源不絕的好菸與好酒。感謝一路走來的老朋友們：Josh、Sean、Duncan、Tony、Joe、Leo、Byron、Alex，還有兄弟們：Steven、Johnson、Jack、Kevin 與 Danny。感謝政研所與其他學校的同學與朋友們：紘麟、育和、曉欽、孟如、一誠、俊宜、鐵志學長、拓梓表哥、佳萱與怡翎。感謝我在美國的好朋友：John Fogerty 與 Duane Allman，謝謝你們在我枯燥的生活中澆灑甜美的露水。感謝我在加拿大的老師 Peter Prontzos、Dr. Donald Baker、Dr. Alison Bailey，當初若不是你們貴人相助，今天不知道會在哪裡。感謝林世煜先生、吳叡人老師、李俊達主任、溫仲良先生，因為有你們為臺灣添上色彩，讓我感受到她的美麗與哀愁。最後，感謝給我對政治學最初的感動與啟發的兩位巨人：彭明敏教授與史明先生，您的存在有如北極星一般指引著我，在黑夜的海上，航出歸鄉的方向。

萬分感恩佇心內。

張之豪 2008 七月，於基隆

摘要

亞洲區域的整合自冷戰以降，在不同歷史階段產生不同的整合架構，受到冷戰意識形態的限制，海洋東南亞與大陸東南亞與中國的互動自冷戰初期開始分歧。但中國與東南亞區域的整合也在冷戰結束後產生變化，其中最關鍵的莫過於中美建交、東亞金融危機的發生，以及中國與東協國家之間網狀式的微區域合作計畫。

受限於冷戰架構以及自身組織的偏差，東協在冷戰後亟欲尋找新的方向與出路，同時，美國也試圖再圍堵中國的擴張，迫使中國將對外的觸角轉及東南亞國家。雙方的目標一觸即合，中國與東協國家的政治與經貿整合於1997年金融危機後急速成長。東協國家對於外部國家的權力角力，一向以在各大權力之間取得平衡為應對方針，以追求東協本身利益的極大化。但當中國在東亞整合過程中逐漸取得主導地位之際，東協國家在整合過程中有喪失其主導權之虞。

中文關鍵字：中國、東協、區域整合、東亞金融危機、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中國威脅論、微區域主義

Abstract

The integration in Asia has had many phases during the course of history. From the beginning of Cold War, the Southeast Asian region was divided in the two camps. Following the end of Cold War, so came the end of the division of the region. At the same time, China, under the pressure of containment strategy from the U.S., seeks an outlet for its newly developed export-led economy. The integra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ASEAN states witnessed a rapid growth following the Asian Financial Crisis in 1997. From then on China slowly (but surely) gains its dominance through various multilateral agreements on trade, regional cooperation and regional development. ASEAN's strategy in the process of integration has always been seeking the balance of power in the region. This strategy is gradually being undermined with the wake of China's rise to regional dominance.

Keywords: China, ASEAN, East Asian regional integration, Asian Financial Crisis, micro-regionalism,

目 錄

口試委員會審定書.....	II
謝辭.....	III
中文摘要.....	IV
英文摘要.....	V
目 錄.....	VI
第一章 前言.....	1
第一節 研究緣起.....	1
第二節 文獻檢討.....	4
第三節 研究觀點與分析架構.....	7
第四節 章節安排.....	11
第二章 冷戰結構下從對立到和解，1949-1989.....	14
第一節 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下的東亞.....	14
第二節 東協成立後的意識形態鬥爭.....	22
第三節 中國經濟改革及對東協的和解.....	29
第四節 小結.....	32
第三章 後冷戰時代的交流與合作，1990-1999.....	33
第一節 美國新圍堵政策下的東亞.....	33
第二節 中國的「反和平演變」政策及與東協雙邊關係的發展.....	38
第三節 東協的內部整合與對中國友善關係的發展.....	43
第四節 小結.....	47
第四章 東亞金融危機後的積極整合，2000-2007.....	48

第一節 東亞金融危機與中國的抬頭.....	48
第二節 東亞主義的發展與「東協+」體系的擴張.....	52
第三節 中國崛起及與東協的整合.....	57
第四節 小結.....	60
第五章 結論與展望.....	61
參考書目	
中文.....	72
英文.....	76



第一章 前言

第一節 研究緣起

近年來，區域整合與區域主義在比較政治學與政治經濟學中漸成爲重要的研究主題，正如全球化研究一般，其起源、發展、互動、影響、反動都受到相當的關注與探討。隨著通訊與交通科技的發展，資本與商品的高流動性，全球化的腳步不斷地在衝撞各區域與各國家既有的政經社會結構。有論者以爲全球整合與地方自主並非是零和的選項問題，而是兩個平行且彼此互動的過程（Bright and Geyer, 1987）。也有論者也認爲全球化與區域化是在全球結構變遷浪潮中，同時並進的兩個演進過程（Hettne, 1999）。亦有人認爲區域整合是第三世界國家對於新自由主義下全球化的反擊（Mittelman, 2000），有人認爲全球化的後果過於龐大，贏家與輸家的賭注都大過單一國家所可以負擔，因此必須要組成區域來予以回應（Boas, 2005: 3）。有人則以爲區域化是國家爲生存所採取的理性行爲（Bhagwati, 1991）。不論如何，區域整合與全球化同時成爲當代重要的政經發展現象，並且在不同地區與國家各有不同的內涵與發展脈絡，也各有不同的核心議題。

冷戰後，區域主義與區域整合開始加速腳步，並且走向更密集與多元的形式，也逐漸朝往建制化的方向邁進。從 80 年代與 90 年代各種新生與重現的區域組織來看，可以發現一些端倪，例如：1991 年設立的北美自由貿易協定（NAFTA），同年於拉丁美洲設立的南方共同市場（MERCOSUR）、1989 年設立的亞太經貿論壇（APEC）、自 80 年代中期進一步走向更緊密的政經整合、單一市場的歐盟（EU）、南非發展共同體（SADC）、與 90 年代開始轉變爲更主動的區域主義載體的東南亞國協（ASEAN）。

臺灣的生存與發展問題不僅僅是國家內部的政經體制的脫序與重構，它們往

往是深深鑲嵌在超越國家層次的區域與全球結構中。因此，臺灣所面臨的問題與困境若要能突破，勢必要面對與處理兩岸、亞太與全球化的問題。從地緣政治角度看，臺灣處於日美所代表海洋世界及中國所代表歐亞大陸世界之間；而從軍事安全層面看，臺灣又是處於兩者所代表的全球霸權與區域霸權之間。若從地緣經濟角度看，臺灣正處於日美所代表全球主義及中國與東協各國所代表區域主義之間。這種政經層面都屬中介性的角色與地位（蕭全政，1995：253）。而中國與東南亞國協的整合，正是揉合兩岸與亞太關係的問題之一，它不是單面向的議題，反之，它擁有高度的地緣政治、經貿與全球意涵。因此，對於亞洲本身的區域整合與研究是臺灣要面對外部政經結構的限制時，一個相當迫切的課題。

在東亞的整合與區域主義發展最為悠久、最具制度化、與最為完整的莫過於東南亞國協（ASEAN）。自 1967 年，於美越戰爭高峰的時期，為阻止共產主義的擴張，印尼、馬來西亞、菲律賓、泰國與新加坡成立了東協。蘊有豐富石油資源的汶萊緊接著加入，在 1997 年，在印度支那半島上三個彼此間仍有軍事衝突的國家高棉、越南與寮國，也陸續加入。在東協建制的過程中，也隱含國家自我的盤算，比如為求國家經濟發展而訴諸區域性組織來穩定區域外部勢力，還有東協內部國家之間的角力，如印尼對於成為區域領袖的嘗試和新馬兩國對印尼的牽制，不同盤算的結果卻都讓東協成為各方均可接受的共識。東協於 90 年代不斷朝整合的方向邁進，讓東協的區域化成為 20 世紀末，21 世紀初在全球最受矚目的現象之一。東南亞與東北亞的整合也在 90 年代中期開始加溫，其中最關鍵的莫過於 1997 年的東亞金融風暴，金融風暴的重要影響之一，就是強化東協國家對全球治理組織如世界銀行與國際金融基金等西方勢力的排斥，加速日後的東協加一、東協加三、清邁協議、與東亞高峰會等亞洲區域整合的發展。

2006 年十月，在中國廣西南寧舉行了「中國—東盟建立對話關係 15 週年紀念峰會」，這個峰會標記了中國自 1991 年起對東協國家「睦鄰」政策上的里程碑。

在這十五年間，中國與東協一步步地從嘗試建立對話機制、搭建東協加一平台，到東亞高峰會，再至建立自由貿易區以及多領域的合作。以下為中國與東協的合作與對話關係之歷程：從 1991 年起中國對東協所有國家建立或恢復外交關係，並於 1996 年成為東協全面對話伙伴；1997 年，中國加入「東協加三（10+3）」與「東協加一（10+1）」的對話機制；2002 年中國與東協國家簽署《全面經濟合作架構協定》；2003 年中國加入《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2005 年東協加三又轉型為「東亞高峰會」（East Asian Summit）。

從經濟整合與自由化的角度而論，中國與東協之間的整合有違其他地區如北美自由貿易區或歐盟整合的動機，因為雙方都是以勞力密集與生產出口為主的經濟形態，雙方的替代性似乎大過於互補性。在中國與東協國家之間所簽署的協議與合作關係間，若單就經濟角度來檢視，雙方的得與失並不平衡，中國並不能從相關的協定中得到太多經濟發展的利益。但相關的合作計劃仍舊不斷地在進行，從《湄公河開發計劃》、《黃金四角》、《孟中印緬合作區》、《兩廊一圈經濟區》等微區域主義（micro-regionalism）到宏觀的東協加三、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東亞高峰會的倡議與實行，整個中國與東協間的合作似乎沒有停歇。但如前所言，雙方箇中的矛盾卻沒有被有效的解釋。並且，在東協內部的不同發展程度與國力也讓它們不見得有一樣的利益與盤算，這也影響了東協各國與中國的互動有所不同。有論者以為中國與東協的友善關係是中國為其「和平崛起」策略的妥協，而另一方面是東協為有效因應來自全球化與歐洲、北美區域主義的壓力所採取的策略。

在中國與東協的區域整合進程中，有論者漸感到居於東亞樞紐地位的臺灣被「邊緣化」的危機。要瞭解這一波的中國—東協的整合過程是否真的這麼嚴重地將會在可見的未來將東亞至東南亞區域化，必須要解開其間的經濟與政治的環節。簡單地說，臺灣若要解決目前所面臨的可能被邊緣化的危機，必須先釐清中

國與東協的互動基礎，雙方的合作與矛盾，尤其是要回顧整體亞太地區的政經發展結構，中國—東協雙方各自面臨甚麼樣的結構限制與發展方向。

中國自建國以降，從一開始的生存問題，到後來尋求發展空間，最後更走向爭霸的道路，都可以在東亞的陸海爭霸邏輯中看出端倪。冷戰時期中國與支那半島上的大陸東南亞（continental Southeast Asia）盡量取得平和，但在冷戰後期則不斷地在嘗試將觸角伸及海洋東南亞（maritime Southeast Asia）。當中國終於成功在90年代後與海洋東南亞走向進一步的整合，中國作為區域霸權，甚至世界強權的努力也終得以有初步的成果。冷戰後各時期的不同歷史發展與政經結構都影響著中國對東協的整合策略。同樣的結構也影響著東協國家對中國的觀感、定位與策略。



本研究的目的是在於探求全球與亞太政經結構中，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合作與矛盾的結構與因果關係。首先將回顧冷戰前後的亞洲政經結構，中國與東協各自的發展歷程，尤其是東協內部不同國家的發展與秉賦，當今的東亞區域整合過程中，雙方目前的發展進程與原因，再進行分析。

第二節 文獻檢討

有關於中國與東協的區域整合的相關文獻，基本上分為三種：經濟合作發展、中國崛起的區域安全觀點，以及區域爭霸的觀點。

第一類經濟合作發展的觀點建立於自由主義的基礎，認為在以自由化作為意識形態的基礎上，降低關稅與自由化將導致貿易創造效果與貿易轉移效果，進一步帶動區域內外貿易與投資的增加。這種觀點放置於中國與東協，甚至現在更擴

大的南亞與東北亞來看，區域合作可能形成的自由貿易區與貨幣統一，將成爲世界上最大的自由貿易區。中國官方爲此觀點最主要的倡議者（朱鎔基，2000；張蘊嶺，2002；林錫星，2002；林梅，2002）。這種論點將區域經濟合作先驗性地聚焦在經濟利益，將其認定爲合作之因，並忽略其他合作的原因。此種線性的經濟發展理論也有可能涉及中國官方自身的「和平崛起」策略的一環，可說是在論述上的刻意偏差。但許多其他相關的論者則是純粹被去脈絡化的經濟解釋的偏差所限制，對中國與東協在政經結構中的其他限制與機會都無法作整體解釋。

第二類文獻則是以懷疑論者爲主，將中國與東協的區域整合視爲「中國崛起」的一步棋。可以說是認爲中國終將崛起成爲足以挑戰美國的世界級霸權。西方國家間，以美國的保守派爲首，一直對中國的崛起懷有相當的戒心。除去美國鷹派自身對世界各形成中的可能對手一直過度渲染其威脅性的偏差以外，其觀察並非毫無根據，但是往往流於偏狹與單面停留在安全的層次。對「中國威脅」最明顯的展示無疑是 1999 年出版的《考克斯報告》（The Cox Report），其中細數中國竊取美國核武科技的指控。美國學界意識到中國崛起後，對此與其區域戰略的檢討一直沒有停止，除了美國全球政治中心的亞洲研究主任芒羅（Ross Munro）所指出的「中國不斷地擴張與區域整合，將導致在 21 世紀美中會有一場無法避免的戰爭」這種最極端的論調以外，也有其他像美國加州柏克萊大學桂格（James A. Gregor）以中國在東南亞的合作與擴張來警告中國對世界和平的威脅。這樣的論點通常集中在中國將取代日本成爲亞洲過往經濟發展的主導者，並因爲其產業結構與發展途徑與東協週邊國家的類似，將會與其互斥，不僅會首先威脅亞洲週邊國家，最終將也會挑戰美國的超級霸權地位。這類中國威脅論的文獻被第一類文獻的倡言者所回應，經濟發展論者將中國目前的發展定調爲「和平友好」與「互利共榮」。其中又以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成爲世界體系的一份子，並積極地推動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區等努力，中國「只」追求穩定與和平的發展，因爲只有和平的外在環境才有利於中國自身的經濟發展爲主要論點（宋鎮照，2003；邊裕

淵，2002；曹雲華，2002)。但是這兩造的對話其實並沒有交集。只是一方已經先驗性地對中國所有的逐步發展與任何行爲都單純視爲「威脅」，而另一方則以辯解性 (apologetic) 的說法在強調經濟發展不必然促使著中國追求在其他方面的發展與控制。而且，這種文獻幾乎完全視東協國家爲被動地接受來自中國的影響，而忽視東協國家自身在亞洲整體結構下仍然存在相當有彈性的能動性。

第三類文獻是著重於中國在區域內部的霸權爭奪。東亞地區在冷戰結構下，政治與安全的主導權在美國，而在經貿方面則是美日兩國分享主導權。但是在冷戰結束後，美國駐軍不若以往，日本也因爲經濟的泡沫化而陷入蕭條的泥淖中，又因爲東亞金融危機讓美國爲首的西方勢力的正當性在東南亞受到嚴重的挑戰。與此同時，中國卻在經濟改革後，不斷地對東協國家示好，在東亞金融危機之後更被東協國家視爲可能扛起東亞金融體系責任的力量。在中國與東協的整合過程中，中國與東協同時可得到各自想要的：中國要成爲區域強權，東協國家要向東看，並在面對西方時，擁有更大的自主性。這讓與中國合作成爲東協的選項之一，以此來牽制美國在亞洲的影響力 (林祖嘉，2002；蔡增家，2002；朱文暉，2003)。此類文獻較以區域主義的角度來探討國家與集團間的權力消長，東協國家、美國、日本、南韓與中國等國家與集團間合縱連橫的角力。但是往往較少著墨於個別國家彼此間較小規模的合作，並且忽略各國的國內因素。在此間許多合作間的宣示性意味其實並不亞於實質性。

本論文將整合以上幾種觀點，尤其是經濟與政治因素的整合，較有利於整體的觀察。並且將試圖排除單純政治安全或經濟利益面的分析，並將其間權力的運作與歷史發展的脈絡釐清，這將有助於更精準地觸及中國與東協整合的核心因果關係。

第三節 研究觀點與分析架構

本論文將以政治與經濟整合的觀點，以權力、稟賦與利益三者為基本的分析架構，並從國家、區域、全球三個層次切入，從中國與東亞地區的實存歷史進程中，為中國與東協國家的整合在整體的政經脈絡中定位，並探討在區域政經結構下，中國與東協國家在整合過程中的結構限制與突破結構地位的企圖。以及中國與東協國家的整合又如何影響亞太區域與全球的政治經濟結構。藉由對中國與東協國家整合的整體歷史結構與演變過程的探討，在特定歷史情境與發展階段中，國家與區域對利益與權力的追求如何在國際與區域的政經結構中被被動影響與主動對應。本論文將以歷史結構的研究方法，試圖突破其他理論框架，將宏觀的政經結構與微觀的微區域主義的合作進行整合，以求得更全面與整體的脈絡。

「政治」指的是與權力分配、行使及其後果有關的事物，政治分析所關注的乃是社會關係中所涉及的權力關係（Hay，2008：4）。在此同時，「世界上決不會有離開經濟動機的純粹政治活動。每種政治事件都包含著重要的經濟因素和意義」（張金鑑，1966）只要政治動力的存在必須符合某些經濟條件，那麼政治分析就應當認知到這些條件的存在並加以深入探究（Hay，2008：4）。由於「權力」與「利益」間不可分割的互動關係與共同基礎，因此必須要將政治現象與經濟現象的探討加以整合。政治與經濟最終關注的仍是利益的實踐，只不過在利益的實踐過程中，政治與經濟各有不同的功能與內在邏輯：政治側重於資源汲取的極大化，而經濟則是資源配置的極佳化。而對特定行為者而論，政治與經濟行為，皆表示行為者依其自身自利的動機，利用其稟賦以汲取資源與追求利益（Gilpin，1987）。

因此，本論文採取政治與經濟整合的觀點對中國與東協整合的這個政治經濟

現象進行分析，並試圖排除過於抽象化、形式化與一般化的理論概念，改以兼具主觀理性行爲與客觀結構的互動所呈現的歷史特殊性做爲分析途徑。行動者是整體歷史因果發展的最重要觸發者，也是最後結果的承載者。唯有落實到行爲者的層次，才能知道歷史因果的果爲何，也才能瞭解整個歷史的因。所以，如果要分析政治經濟現象，解決政治經濟問題，就要先分析歷史的因果（蕭全政，2007：49-50）。

政治與經濟整合的基礎在於主觀行爲者與其客觀稟賦的互動關係。當行爲者以政治邏輯與經濟邏輯行使對權力與利益的追求時，單就行爲者主觀行爲層面的理性、偏好等自利行爲是不足的。同時我們必須要觀照該行爲者的客觀稟賦特質。「稟賦」可以是政治的也可以是經濟的。在行爲者追求自身利益的資源取得與極大化時，必然涉及與其他行爲者的競爭，而競爭的本質即是權力的運用。行爲者需要根據其自身的稟賦與資源，運用權力以取得利益。稟賦是行爲者從事政治行爲與經濟行爲的重要基礎，基本上包括各種有形、無形能爲行爲者動員以追求利益的資源；稟賦並隱含著行爲者從事政治或經濟活動所將面臨的機會與限制。稟賦的變遷即表現相關行爲者的自利活動在動態歷史過程中的變遷；擁有不同稟賦的行爲者間的關係與互動，必須從整體社會歷史的結構變遷中才能完全掌握（蕭全政，1988：43-44）。

「利益」一詞，某些時候也可以指涉賭注（stakes），是高度抽象的概念。可以說行爲者爲確保「自己」的存在與發展，必然會有自利性的行爲。其中，有助於行爲者「自己」的存在與發展的，都屬於他的利益範圍（蕭全政，1988：50）。因此，行爲者如何認定「自己／他者」以及何爲「自己」的利益即爲重要的課題。如何釐析國家在國際關係中解答「你是誰」—自我認知的形成、機制與內涵？以及如何在國際社會的建構中掌握「你與他者」之差異（獨特的利益與偏好設定）隨時空進程而衍生的動態發展（Hopf，1998：174-176；李文志，2003：10）？

事實上，行為者確認其「自己」或立場的過程，決定於相關時、空與人的條件。因此，利益的內涵與特質相對地決定於不同時、空、人的條件（蕭全政，1988：50）。

在分析行為者確認其「自己」的利益的過程時，必然隱含更深層的「偏差」（bias）。任何形式的政治組織都隱含特定的偏差，這種偏差僅利於某種衝突的呈現而壓抑其他衝突的表面化，因為組織本身即是某種偏差的動員（mobilization of bias），因此，某些議題會被安排進入政治領域，而其他則被排除出去（Schattschneider，1960：71）。在這裡，組織（organization）若被代以整合（integration）一樣適用。中國與東協國家的整合一樣有特定的偏差，尤其是偏差的動員。整合的動機與目的都不是中性或單面向的，反之，它們都有特定的議程（agenda），不論是手段性的或是目的性的。特定的偏差隱含著特定的利害關係，因此，理性行為者必須權衡自身之稟賦與各個利害關係進而選擇對其有利的偏差結構，以達到資源利用的極佳化與資源汲取之極大化（蕭全政，1994：51-54）。

在國家的層次，中國與東協國家在冷戰體系下分別承襲美蘇兩方不同的意識形態陣營因而有其不同的經濟與國家發展。中國自 50 年代的毛澤東的外交政策方針下，採取較為封鎖的基調，將中國的外交與經貿限於敵視國際體制與共產國家互助的框架內，讓中國與東南亞的互動限制於親共的緬甸與北越等國。但在鄧小平掌權的 1978 年後，整體政經結構的現代化與改變，讓中國以不同的面貌來處理與東南亞的關係。進而有與東協國家更積極整合的政策。中國在這時也從以對內的「反和平演變」發展為日後的「和平崛起」，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爭霸的路途既要低調謹慎，又必須積極佈局，中國在冷戰結構與國內政經體制的結構下的國家發展歷程都影響不同時空下的特定立場與政策考量。

東協國家則在美日為首的「雁行」經濟發展模式下，進行國際市場的分工與發展。不同東協國家本身也各自具有不同的國內與區域間的演變。印尼因為戰後的國內政治之故，與中國互動時冷時熱，有時採取印度式的不結盟政策與中國互動頻繁，有時又因右派強人的上臺而敵視中國。而泰國則因為中國與柬埔寨的建交而與中國有數度摩擦，並在 60 年代因捲入越戰，國內出現共產勢力的武裝鬥爭，而正式與中國為敵。直到中蘇交惡後中國才開始積極改善與東協的關係，並在 1972 年中美關係正常化後，雙方才逐漸冰釋過往的對抗政策。直到東協正式地進入整合，才開始較為一致地進行與中國的互動與整合。當東協於 1977 年締結優惠貿易協定時，東協才算正式進入區域整合的階段，而與中國的整合也正式開啓。東協的整合原則是「共識決」，這其中也表明東協內部的政經發展不均與各別安全與相關政策的不一致性。

東協整合一直在 1977 年才正式有實質的協定產生，可以說是來自區域外強權——美國的刻意安排（Carpenter，1998：294）。在此以後，有關於區域整合的動力來自於各方，最後東協分別與中國、日本、南韓都簽署了相關的自由貿易的倡議。然而，在區域上，東協仍然在追求東南亞區域內部的整合，以強化自我經貿實力。事實上，東協無時無刻不在擔憂來自外部的政經壓力，特別是以產業同質性最高、吸引外部投資（FDI）的競爭最具威脅性的中國，以及國際金融機構組織如 IMF 與世界銀行。

以全球的層次來分析，又可以看到檯面上許多經貿協定的簽署、眾多繁雜的合作項目，以及各式不同的倡議，都仍然被壟罩在海陸爭霸與亞太主義、東亞主義、東協主義等不同內涵的區域主義競合的宏觀結構之下。從冷戰結構的陣營分佈，與扇形戰略的提倡，到中國的「反霸」戰略，在經濟自由化、全球化的背景下，東亞區域的合縱連橫都反映出更大的圖像。全球的結構背景、中國與東協整合對結構所造成的影響與改變都不得輕視。

第四節 章節安排


本論文冀望以歷史結構研究方法，針對中國與東協整合的分析得到該現象在亞太整體區域整合中的定位，並藉由雙方不同層次的區域整合窺探實存的政經結構與趨勢，從多重的互動下觀照其對亞太區域的影響與衝擊。因此，整體冷戰結構的形塑、中國與東協建制的政經發展脈絡、雙方的互動與整合進程將是本文之重點。

第一章為「導論」。本章將在研究動機與目的中突顯區域主義與整合之於國家與全球的影響，並闡釋中國與東協的整合之初步介紹。其次，在文獻探討部份將分析各種不同的典範與認知如何分析該整合現象，試圖藉由簡介相關文獻作出其優缺點之評析。

在研究結構與方法部份，將說明政治與經濟整合的觀點，以及權力、利益、稟賦與偏差各概念的初探。再以國家、區域、全球的層次切入中國與東協在地緣政治與經濟合作，以及區域和全球結構的不同意涵。最後就章節安排作一說明。

第二章為「冷戰結構下從對立到和解，1949-1990」。本章將就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國際政經體系變遷作一結構性分析，美蘇的對立所產生的兩極體系、在追求經濟秩序重整中所建立的垂直分工體系，以及在亞太區域形成的結構背景。另外，也將探討東協各國與中國的發展過程與整合的開始，以及中國的外交戰略與對東協關係的演變。在冷戰結構下的中國從毛澤東時代的「一面倒」的外交政策，並效法蘇聯進行對東南亞的「革命輸出」，使東南亞國家各政府深感威脅，也間接促使以反共為宗旨的「東協」的成立。經由美蘇中競合關係的變化，中蘇交惡

後，中國在全面改善對外關係的同時，也追求邊境緊張關係的和緩，因此中國逐漸轉變其政策（Yahuda，1996：193-201），並開始向東南亞（尤其是印度支那半島的大陸東南亞國家）伸出觸角，降低來自南方的威脅。東南亞諸國則與這時期的中國有各自的交流，尚未達到整合的階段，並且在東南亞諸國彼此之間的矛盾亟需來自美國的做中間的調停與整合的力量，直到 1967 年東協的成立都讓東協與中國的整合在此階段被設下很大的限制。中國與蘇聯關係的惡化導致中國必須要向邊境國家拓展其對外關係，同時中國於 1970 年代初開始與美關係緩和並加入聯合國，在此時期，中國開始進行睦鄰外交策略，積極與東協改善關係，再加上毛澤東時代的結束，「獨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孤立政策走向轉變為「改革開放的和平外交」，陸續與東協各國建立外交關係。



第三章為「後冷戰時代的交流與合作，1990-1997」。本章就冷戰後期的中美建交、後冷戰時期一超多強體系的建立，與亞太區域發展的困境，以至造成 1997 年東亞金融危機的結構條件與背景作一探討。自冷戰後期起，東協國家便開始與中國展開互動，也因為美國自越南撤軍，與尼克森主義所強調的「和解」政策的影響，東協國家開始擁有對外較為一致並自主的政策。冷戰結束後，1989 年的天安門屠殺事件所引發來自西方國家的經濟制裁，尤其在美國對東亞大陸的新圍堵政策影響之下，以美日為首的海洋力量以「和平演變」來圍堵並給予中國壓力。中國內部自 70 年代起的經濟改革受到相當的阻礙，過往中國以經濟改革來紓緩「和平演變」的方式受到阻撓，這逼迫中國必須轉進東南亞與非西方國家以拓展其對外經貿關係，也因此中國擱置南海主權等與東協國家長久以來最大的矛盾與爭議。在中國不斷示好的情況下，東協也對中國改較為友善的外交經貿關係，1991 年，中國與東協全面恢復外交關係，合作多個協議與組織，此階段為雙方關係正式加溫的開始

第四章為「東亞金融危機後的積極整合，1997-2007」。本章就東亞金融危機

後的亞太區域為主，對中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WTO）、九一一恐怖攻擊與其對美全球戰略的影響、東南亞與東北亞的經濟合作整合，產生了東協加三、東亞高峰會，甚至中國與東協的自由貿易區等進行分析。這些事件都不斷地在刺激中國與東協雙方的整合範圍、步調、與考量。中國與東協在這段期間所作的整合以經貿為主，雙方的整合走向更正式的建制。經過二十多年的發展，中國成功解除內外多個矛盾而走向「和平崛起」的道路，並以金融危機為契機，加強自身在東協的影響力。東協也結束了多年來對於共同建制目標的欠缺，走向建立特殊金融與經貿共同體的道路，開啓了「東協+」體系的建立，這也讓東協與區域內大國進行區域整合時更有實質的內涵，逐步擺脫過往口號大於實質的「形式化共同體」。

第五章為簡單的結論與展望。



第二章 冷戰結構下從對立到和解，1949-1990

第一節 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下的東亞

十九世紀以前的東亞，在歷史、地緣與文化上長期以來一直保有密切的關係，而在政治、經濟、外交與安全各層面上更是存有著互賴關係，整個東亞當中的霸權核心，則集中在東亞大陸上的帝國，直到清朝為止。在十九世紀到二十世紀間，西方帝國主義與殖民主義改變了東亞的政治經濟結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更是幾乎完全切斷了中國與東南亞的密切關係。於是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在冷戰時期所面臨的是一個從零開始的局面。冷戰結構影響著雙方各自的發展模式，也限制著中國與東南亞的關係。

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後的世界，被美國與蘇聯所分別代表的資本主義集團與共產主義集團分割為兩半。1946年2月，蘇聯總理史達林在一場演說中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發生，是資本主義發展的必然邏輯，因此該當以共產主義取而代之」；同年三月，英國首相邱吉爾也表示：「一幅橫貫歐洲大陸的鐵幕已經落下。」自此，「冷戰」正式成為描述二戰後世界局勢的代名詞（王曾才，1989：480）。

這兩國以意識形態為名，在政治體制、經濟模式與軍事上對立，形成了冷戰的兩極體系。這個以美、蘇爭霸為核心的東西對抗，事實上是循著政經意識形態和地緣政治特質上的差異而開展，並因而展現東西兩大陣營間的冷戰對峙（蕭全政，2004：4）以美國為首的西方陣營於1944年簽署「布列敦森林協定」所確立的「布列敦森林體系（the Bretton Woods System）」。1947年由24個國家所簽訂的「關稅暨貿易總協定（the 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並緊接著成立國際貨幣基金會（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及世界銀行（World Bank），確立了以自由貿易之名為主軸的貿易與金融體制，使西方陣營得以對開發中國家產

生較為不利的偏差之餘，還對奉行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的國家產生排擠作用。另一方面，在 1947 年，美國警覺到蘇聯的勢力逐漸開始散布至西歐與南歐，遂以圍堵政策對應，杜魯門總統於 3 月 12 日發表了後世稱為「杜魯門主義 (the Truman Doctrine)」的演說，表示將在軍事與經濟上支援希臘與土耳其，以免其落入共產主義的勢力之下。在美國對蘇聯整體的圍堵策略上，較為軟性的是馬歇爾計劃中對西歐的金援與戰後重建，而杜魯門主義則代表的是強硬的軍事面 (Freeland, 1972)。杜魯門主義的精神，也將在日後擴張至冷戰中美蘇在全球的各式衝突對待，可說是最不修飾，最直接的對立姿態。美國首先與拉丁美洲諸國簽署共同協防條約，並於 1949 年與大西洋週邊盟邦組成大西洋公約組織 (NATO, North Atlantic Treaty Organization)；在東亞方面，韓戰於 1950 年六月爆發，於是美國與日本、南韓、菲律賓、澳大利亞和臺灣等太平洋國家先後簽署雙邊共同防禦條約，因此而促成 1954 年東南亞公約組織 (SEATO, Southeast Asia Treaty Organization) 的出現。

在共產半球，蘇聯也相對地於 1955 年主導華沙公約組織 (the Warsaw Pact) 的成立以與北約組織分庭抗禮。在此同時，「第三世界國家」也開始浮現其嘗試突圍的努力，1954 年四月，緬甸、斯里蘭卡、印度、印尼、巴基斯坦五國總理在可倫坡 (Colombo) 集會，印尼總理沙斯特阿米佐約 (Ali Sastroamidjojo) 提議召開亞非會議 (Asian-African Conference)。該會議於 1955 年 4 月，在印尼的萬隆 (Bandung) 舉行，其時隸屬於蘇聯陣營的中國，則在印度的建議下被邀請參與。萬隆會議開啓了有別於美蘇兩陣營之外的第三條路—不結盟運動。亞非會議旨在加速結束戰後一些第三世界國家尚存的西方殖民統治，並拒絕新一波的包括美國與蘇聯帝國主義霸權的控制。分屬於美蘇不同陣營的國家也不全然被排除在外，包括日本、中國都有參與。這也讓中國得以在封閉的兩極體系中開創一定的空間得以與對立陣營或於冷戰邊緣界線的國家開啓對話與交流。

冷戰局勢下的東亞，亦在這個兩極體系下有不同的發展。中國與蘇聯於 1950 年簽定「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共同支持亞州各國共產黨的游擊叛亂行動。中國在建國之初，基於美國有干預中國內戰的前科以及其意識形態的對立等因素，使得中國對美國沒有信任感。再加上建國初期，國家內部的重整與國際地位都尚未穩固的情形下，為求蘇聯對新中國的支持，中國採取對蘇聯「一面倒」的策略。

中國從建國以來，其外交政策即在一個矛盾的情境中，一方面，毛澤東提出要追求獨立自主的概念，但另一方面卻緊密跟著蘇聯的步伐「一面倒」，不時受限於來自蘇聯的壓力。在 1945 年，蘇聯與中華民國國民黨政府簽署「中蘇友好同盟條約」，出賣了中國共產黨的利益，雖然事後蘇聯以 1950 年的「中蘇友好同盟互助條約」來修補雙方關係，但可以說這都顯示出雖然同為共產陣營，但彼此互信基礎並不穩固，也可看出中國在「聯盟」與「友好」的種種外交宣示上，實際追求獨立自主的本質。

在冷戰結構下，美國所要考量的戰略敵人包含整個共產陣營，並不特定針對在共產陣營中的個別國家，然而身處在東亞，又身處在共產陣營的中國，仍然無法避免地被納入蘇聯陣營中。這無疑對追求獨立自主外交的中國是不利的。在這個背景下，中國國家主席毛澤東針對國際形勢作出了獨特的評估，並提出中國對外關係的基本立場與方向。毛澤東於是發展出「中間地帶」與「兩大陣營」的理論。毛澤東認為，在冷戰發動以後，世界各國已分別被納入了美、蘇兩大陣營的旗下，中國是蘇聯陣營的重要成員；然而，在美蘇兩大集團之間，有廣大的中間地帶，這中間地帶中有中型與小型的國家，美國若要對蘇聯發動任何有意義的鬥爭，勢必要贏得這些中間地帶的中小國家為先。也因此，這些中小國家對於美國勢力的抵抗與鬥爭就成為能否阻止或延緩美蘇為主的新的世界大戰的關鍵因素（毛澤東，1963）。對毛澤東而言，這些中間地帶國家中，又分為加拿大、澳大

利亞與歐洲等經濟較為先進的國家，以及亞洲、非洲與拉丁美洲等經濟較為落後的國家兩種，這成為中國在面對亞洲時的重要指標與綱領（毛澤東，1963）。

蘇聯與中國對彼此的信任一直停留在口頭形式而未有實質的實踐，直到1950年六月，北韓入侵南韓引發韓戰，這才確立了中蘇兩國的實質夥伴關係。1950年九月，美國率領聯合國軍隊登陸仁川並挺進中韓邊界。同年十月，中國以人民志願軍名義越過鴨綠江投入韓戰。從此開始，美國對中國展開圍堵策略，從北到南，自朝鮮半島、臺灣海峽至印度支那半島，完全包圍中國對海洋的邊界。蘇聯也在此時才決定對中國提供141項援助與三億美元的貸款，讓中國得以從事軍事建設與經濟發展（Nathan and Ross，1995：89-90），也就是說，先前中國對蘇聯的「一面倒」策略直到韓戰爆發後才獲得成果。

保障中國東北的國防安全是中國決定加入韓戰主要因素，以避免在邊界出現國防危機；另外，包括來自俄共史達林的壓力，以及藉調動軍隊以清除剛崗在東北的親蘇勢力，也是考量的因素。中國因為加入韓戰而被聯合國譴責為「侵略者」，因此與美國交惡，兩國關係正常化的進程因此延緩；中國的經濟發展也因為被西方國家孤立與經濟制裁而遭受阻礙，付出了很大的代價。但是中國與蘇聯的互信基礎也因此強化，中國的國際地位也因此提升。韓戰結束後一年，1954年五月，周恩來率團赴日內瓦參加恢復印度支那和平問題會議，與會國家共有九個，其中包括美、英、法、蘇，這是中國建國以來首次參加的國際會議。同時中國展開和平攻勢，對美國採取既鬥爭又談判的策略；對第三世界國家則鼓吹「和平共處五原則」，對蘇聯則爭取較平等的聯盟關係。

韓戰結束後，中國為了爭取亞非國家的支持，突破外交上的孤立，採取和平攻勢。所謂的「和平共處五原則」即是1954年四月，中國與印度為解決西藏與印度通商問題而簽定的協議，分別為互相尊重領土主權、互不侵犯、互不干涉內

政、平等互惠與和平共處的五項原則。在同年七月發表的中印與中緬總理的兩個聲明中，三國領導人建議以這五項原則作為國際關係的準則。

東南亞國家在冷戰期間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親蘇聯的社會主義國家－北越。第二類是親美的國家－泰國、馬來西亞、新加坡、菲律賓與汶萊。第三類則是不結盟或中立的國家－緬甸、印尼、柬埔寨與寮國。

1950年韓戰爆發後，親美的國家紛紛加入美國對中國所實施的包圍圈。這個包圍圈是美國在韓戰爆發後，對中國所進行的政治、經濟與軍事等層面全面性的圍堵，以防止骨牌效應（the domino effect）在亞洲發酵。在政治方面，美國聯合西方陣營的多數國家孤立中國，不承認中國的外交地位，也使中國在聯合國取得會員席位。在經濟方面，美國促成聯合國通過貿易禁運決議（直到1971年始有所鬆動），對中國實施貿易禁運政策，試圖將中國隔絕於世界經濟之外。在安全方面，美國則在50年代先後與日本、澳大利亞、紐西蘭、南韓、臺灣簽定雙邊的軍事防禦協定，並在1954年九月與英、法、澳大利亞、紐西蘭、菲律賓、泰國、巴勒斯坦等七國訂立「東南亞集體防禦條約」，從而形成對中國半月形軍事圍堵（周桂銀，2002：75-76）。

除了南韓以及台灣，身處中國周圍的亞洲新興民族國家因為不願讓自身捲入美蘇東西集團的對抗，且剛從西方列強的殖民統治中脫離，對西方國家仍然戒慎恐懼，尤其在主權與外交上特別強調獨立自主，因此這些新興民族國家的外交政策大都採取不結盟或中立主義的策略。中國則在此找到了拉攏與遊說的彈性空間，希望能爭取這些獨立於美蘇東西兩大陣營之外的國家的支持或靠攏，而這些東南亞與南亞國家遂成為中國第一波睦鄰的主要對象。

主導中國第一波睦鄰的靈魂人物，即是當時的中國總理周恩來。周恩來企圖在東西兩大陣營之外另外開拓空間，以中國作為「中間力量」的主軸，並以此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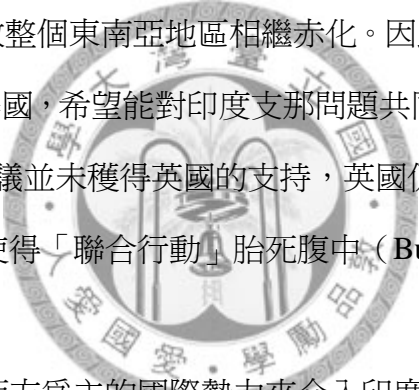
取身處東西兩大陣營之外的國家之支持；他說「我們要依靠進步，爭取中間，分化頑固。這樣可以使我們的外交工作更靈活一些，不是簡單的兩大陣營對立，沒有甚麼工作可做。我們要這樣來打開我們外交工作的局面」，而這些「中間力量」則是當時周邊的新興民族國家，周恩來認為這些國家「在戰爭與和平問題上同帝國主義有矛盾，我們要在戰爭中爭取它們中立，在和平時爭取它們同帝國主義保持距離」（周恩來，1990：54）

中國第一波睦鄰政策主要思維方向，即是拉攏在中國周邊的新興民族國家所形成的新興中間力量，此舉一方面是為了穩固與增強中國的勢力，同時也希望以此突破美國在中國周邊所構築的包圍圈，進而達成「確保國家生存與安全」的主要目的。因此，中國的第一波睦鄰政策即為在其周邊建構一個安全緩衝帶，而其過程主要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個階段是「提出和平共處五原則，使大國勢力退出周邊地區」；第二個階段是「以和平共處五原則化解周邊國家的疑慮，並擴展與周邊國家的往來」；第三個階段是「周邊環境惡化與邊界領土問題導致和平共處五原則破產」（陳一誠，2006）。

直到韓戰於 1953 年七月正式結束，聯軍退回北緯 38 度以南，中國才終於放下東北邊境的焦慮。當朝鮮半島的安全緩衝帶重新建立後，中國又將目光轉向了東南方邊界的印度支那。1953 年韓戰結束後，在印度支那進行的法越戰爭，隨即成為新的焦點。1954 年一月至二月 18 日，美、蘇、英、法四國在柏林舉行外長會議，決定在四月 26 日召開日內瓦會議，討論朝鮮問題與印度支那問題的相關解決方案。日內瓦會議在四月 26 日至六月 15 日討論朝鮮問題，但最後並未達成南北韓統一的協議；從五月 8 日起，日內瓦會議開始討論印度支那問題，共有中、美、英、法、蘇、越南民主共和國、越南國、寮國與柬埔寨等九國代表參與該項問題的討論（陶文釧，1999：160-161）。在印度支那問題上，中國主要的戰略考量是如何使印度支那成為中國在南面的安全緩衝帶，而欲達成此目的，首先

必須讓大國勢力退出印度支那，並進一步「中立化（neutralize）」印度支那；這當中所遭受的阻礙有很多，其中主要涉及兩個問題：第一，如何使法國軍隊完全退出印度支那；第二，一即使法國軍隊退出印度支那，如何防止美國以對印度支那的掌控來進行對中國的南面圍堵。

關於中國對於印度支那問題的解決方案，中國傾向於讓所有外國的勢力退出印度支那，並且打算承認寮國與柬埔寨的獨立與中立地位，另外，中國也要防止越南過度的武力壓迫而使寮、柬兩國倒向美國（陶文釧，1999：167）。另一方面，對美國而言，防堵共產主義在東南亞地區擴散的第一道防線即是印度支那，美國最擔心的即是，法國從印度支那撤守，美國又無法從中介入，使得印度支那被共產黨滲透甚至佔領，導致整個東南亞地區相繼赤化。因此，美國在日內瓦會議召開前夕積極說服英、法等國，希望能對印度支那問題共同採取「聯合行動（united action）」。



但是美國的提議並未獲得英國的支持，英國仍傾向透過日內瓦會議解決印度支那問題，從而使得「聯合行動」胎死腹中（Buszynski，1983：5-12）。

在美國企圖運作以西方為主的國際勢力來介入印度支那問題的同時，中國也對此作出努力以爭取空間，周恩來造訪印度，以「和平共處五原則」試圖說服印度總理尼赫魯，保證中國絕無入侵印度支那的野心，並向尼赫魯確保柬埔寨與寮國兩國的獨立與中立地位。尼赫魯接受後雙方隨即發表中印兩國總理聯合聲明，重申和平五原則（周恩來，1998：38）。

在獲得印度的信任之後，周恩來接著訪問緬甸，嘗試緩解緬甸領導人對中國可能「輸出革命」的疑懼。緬甸領導人的疑懼來自於 1949 年後，在中國內戰中失敗的國民黨政府的部份軍隊從雲南撤退至緬北邊境，緬甸政府一直擔心中國以殲滅國民黨政府軍隊為藉口，直接入侵緬甸；另一方面，在緬甸東面，中國支持的越盟軍隊又在寮國與柬埔寨進行軍事行動。再者，中緬雙方又有尚未解決的邊

界領土爭議；而造成緬甸政府焦慮的國內共產黨叛亂，又因中國提供緬共物質與道義上的支持而獲得助長。上述種種情形，讓緬甸始終擔心中國對其進行「輸出革命」，面對中國這樣一個陸地大國，如果中國打算直接進入緬甸，緬甸幾乎毫無招架之力。周恩來知道緬甸的疑懼，1954年六月27日，在離開緬甸之前的記者會上明確表示「革命是不能輸出的」，此舉顯然是要安撫緬甸的不安（Keith，1992：92）。

美國在日內瓦會議中，沒有成功說服其他國家共同介入印度支那問題以防止共產勢力滲透，甚至擴散至緬甸、泰國、馬來半島與印尼等，只好轉而尋求其他途徑。爲了避免整個東南亞地區發生骨牌效應，美國政府加快腳步籌組「東南亞公約組織」，用以圍堵共產主義在東南亞地區的蔓延。在日內瓦會議結束兩個月後，「東南亞公約組織」正式成立，其成員共有美、英、法、澳、紐、菲、泰、巴基斯坦等八國，然而，東南亞公約組織從一開始就未獲多數亞洲國家的實質支持，除了泰國與菲律賓之外，其他的成員國皆來自東南亞地區之外（Hess，1990：286）。除了泰、菲以外，其他的東南亞國家都沒有加入，除了本身的不結盟因素使然，也可看出中國對其周邊國家提出的「和平共處五原則」之成功。中國成功地消除周邊國家先前對它的疑懼，使這些國家相信中國欲與其「和平共處」。中國的「和平共處」外交策略不僅大幅削弱了美國對其圍堵的力道，並爲自己突破孤立、封鎖，對外開拓可能的結盟空間，在印尼與緬甸的引薦下，得以獲邀參加1955年的萬隆會議（亞非會議）。

第二節 東協成立後的意識形態鬥爭

在冷戰時期的東西對抗與南北對峙的情勢下，東亞地區的區域組織主要可分為三類，第一類為反應東西冷戰格局下，外來西方勢力所主導而成立的組織，即東南亞公約組織和亞洲開發銀行（ADB）；第二類則反應區域內成員國充分自主性而成立的組織，即東南亞協會（ASA，the Association of Southeast Asia）和馬菲印組織（the Maphilindo）；第三類為區域內成員國主動提議卻還經外來西方國家支持或參與的組織，包括東南亞國家協（ASEAN）、太平洋盆地經濟理事會（PBEC，the Pacific Basin Economic Council）、太平洋經濟合作會議（PECC，the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Council）、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PEC）。東南亞國家協會基本上是承襲東南亞協會以及馬菲印組織的精神、合作內容和組織形式而形成的，但其能超越這兩者後來輪於癱瘓的情況，主要是因為此區域內東西兩陣營間的變化（蕭全政，2001a）。

美國於 1965 年派遣陸地部隊進入越南，正式投入越戰，印支半島情勢迅速惡化；同時，印尼以反殖民立場鮮明與親共的蘇卡諾政權發生了 930 事件的政變而下臺，隨後接任的右派軍事強人蘇哈托轉而親美，並且採取睦鄰政策、強調東南亞一體化的重要性；同年 11 月，當選為菲律賓總統的馬可仕亦宣布減緩對於沙巴主權的要求。隨後，在 1966 年，美國由於參與越戰使其國內經濟日益惡化，尼克森總統在國內輿論壓力下宣布「越戰越南化」，並且持續提倡「以談判代替對抗」的低蕩政策；因此，東南亞國家協會（ASEAN）便於一 1967 年在美國的支持下，由東南亞五國組成。五國代表於泰國曼谷共同發表「東協宣言」，內文寄望以區域經濟合作來促成區域內國家的經濟發展，並期望致力於東南亞地區的和平、繁榮與進步，及加強區域內經濟、文化及社會等方面的合作，希望將東南亞建立成安全、和平與繁榮的共同體。然而，此時東南亞各國一方面飽受國內共

產黨叛變之苦，另一方面，印度支那半島各國亦因越戰擴大而增加其不安的恐懼，東協的成立顯然亦兼具政治與安全的考慮。


於 1971 年英國正式放棄遠東防務，東協國家爲了自保便於同年發表「吉隆坡宣言」（又稱中立化宣言，ZOPEAN，Zone of Peace, Freedom, and Neutrality Declaration），提出東協另一項重要的安全戰略目標－獨立、自主的戰略目標，當中並指出，印尼、菲律賓、馬來西亞、新加坡、泰國決議致力於尋求各國之承認與尊重東南亞爲一和平、自由、中立區，以免除外來強權任何形式之干預，但由於東協各成員國考量之利益有所衝突，因而此時的「中立化」徒具團結假象，實際尚無發揮影響力；1975 年，印度支那半島相繼淪陷，顯示西方國家之軍事保證將更不可靠（林庭芳，2003：21）。

另外，日本自 1960 年代起，便開始對東協國家進行官方開發援助以及企業海外直接投資，前者當時稱之爲賠償援助，主要是針對二次大戰期間，日本對亞洲國家的侵略進行補償性的援助，以改善日本與東南亞各國間的外交關係；及至 80 年代，爲配合美國冷戰時期的亞太戰略，以達到對抗共產勢力入侵的政治目的，以及確保國內石油來源之東南亞航線的安全，日本開始真正進行有計畫的官方援助（蔡增家，2002）。

東南亞公約組織成立於 1954 年，參與國家除了美、英、法、澳、紐、菲、泰、巴基斯坦等八國之外，亞洲周邊國家如南越共和國、寮國、柬埔寨等雖非簽署國，卻另以一份議定書涵蓋在內。在東南亞以外的亞洲，美國則以雙邊條約之方式，分別與南韓、臺灣、日本與菲律賓簽訂共同防禦條約，以此建立東亞／太平洋一線的反共產主義之軍事聯防陣營，成爲全球圍堵策略其中的一環。

東協之成立常被視爲是以經濟合作爲目的並排除政治合作爲目的的（陳鴻

瑜，1992)。因為曼谷宣言中並未將任何政治性議題或字眼納入，東協國家自己也一再強調其並非政治性或軍事性的組織（Djiwandono，1988）。事實上，透過區域內國家之經濟合作，以推動各國經濟發展而成立區域性組織在 1960 年代亦非鮮見。如 1958 年成立之歐洲共同體（EEC）、1960 年之歐洲自由貿易協會（EFTA）與中美州共同市場（CACM）、1969 年之安他斯集團（El Group Andino）等，均以區域內國家所組成，並未包括強權美國。尤其前例兩個中南美洲區域團體，成員國均為經濟上低度開發之國家。相對而言，東南亞國家計劃透過經濟合作，發展互利之區域經濟，使能迅速有效地建立國民經濟的期望，亦在 1961 年成立東南亞協會時浮現（黎世芬，1962）。而這樣的論述，也常讓東協組織成立本身所挾帶的冷戰反共的先驗性偏差遭到忽略，雖然如此，經濟合作畢竟得以有能獲得經濟利益的誘因。而相較於政治性目的，亦較不易發生歧見。



在區域內的經濟合作層面，東協各國在獨立之後，為了擺脫殖民地的經濟格局，紛紛高舉民族主義的旗幟，制定獨立自主的工業化發展經濟戰略，因而有首先採取了進口替代的策略，使得東協五國開始擺脫殖民地單一附庸經濟的地位，走上了獨立自主經濟的道路，並促進了東南亞國家經濟結構的改造，從而初具工業化的規模，並在 50 年代至 60 年代有所發展。東亞產經結構發展歷程則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在 1950 年代至 1960 年代末，是典型的先進工業化國家帶領後進國發展經濟的三級垂直分工模式，由美、日等先進工業國提供市場、資金、技術，新興工業國則利用這些資源負責生產勞力密集型產品出口，東協國家則提供原料和初級產品（蕭全政，2001b），這也就是所謂的「雁行模式」的發展。

60 年代中期，由於國際政經環境相對穩定，進口替代發展戰略已顯過時，出現了新的經濟矛盾，因此東南亞各國調整戰略，轉向出口導向工業化的發展戰略，使本國工業生產面向國際市場，以低階技術的工業製成品逐步取代過去的初級產品、原料的出口，藉由出口的增加，帶動經濟成長，以提升東協各國的產業

結構（陳雄章、楊慧娟，1998）。

值得注意的是，東協國家的發展模式與東北亞國家的日本、南韓與臺灣有所差距。日本、南韓與臺灣均為發展型國家，擁有相對自主的國家權力，專業的技術官僚與受壓迫的社會與利益團體，並且由國家官僚與企業合作的統合主義式的經濟發展，這讓國家整體發展目標以追求成長為優先，分配則較受到忽略。然而，東協國家的發展經驗與東北亞有所差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東協國家並沒有成功動員國內企業資本，反之裙帶資本主義氾濫，這讓東協國家經濟普遍無法成功帶領出特定產業的升級。從進口替代轉型到出口替代後，東協國家仍然無法達成東北亞的經濟發展模式，反之，東協國家仰賴大量的直接外資（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支撐國內經濟，這也造成東協國家的「獨立自主」在經濟方面受到相當的限制，也種下了日後東亞金融危機的遠因。更有甚者，東協國家在產業結構不齊全的經濟體質也造成東協國家在進行區域整合時，時時要受制於人的缺憾。

在 1973 年石油危機爆發，東協各國除了馬來西亞與印尼有石油生產之外，其餘各國經濟均受到重大打擊，且由於世界性的糧食危機，各國亦普遍地發生糧食短缺之問題。

基於上述內外政經情勢的挑戰，東協五國於 1976 年在峇里島召開第一屆高峰會，並簽訂了「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the Treaty of Amity and Cooperation in Southeast Asia）以及「東協和諧宣言」（the Declaration of ASEAN Concord），前者希望能夠把「中立化」轉化成更積極的內部區域合作，重申東協將透過團體行動，以擴張及加強東協在經濟、文化、技術、科學及行政等方面的合作，並再次重申和平解決爭端的共識；此外，亦強調東協對於所有東南亞國家均保持開放的態度，乃暗示東協希望進一步與越南合作，以期未來能和平共存；另一方面，條約

也包含了印尼所提出的「國家彈性」與「區域彈性」之觀點，希望每個國家能爲了求生存與發展而具備因應內外局勢變化的能力，擴及區域層次，則亦能提升整個區域應變全球或區域局勢的能力，此觀念獲得東協國家一致認同，認爲具有「彈性」是正當且必要的，已可呈現出各國願意透過妥協以謀求區域利益的態度；後者則是較爲具體之政治、經濟、社會、文化等合作之行動計畫（陳治萍，1993）；其中在經濟方面，包括基本物資如食物、能源之合作生產與緊急支援（因應石油危機與糧食危機）；大型工業計畫之合作；在東協內部應以建立優惠貿易安排與擴大內部貿易爲長期合作目標；對外以共同力量擴大東協以外的市場及去除貿易障礙；在國際商品問題或其他經濟議題上（如多邊貿易談判、新國際經濟秩序）採取一致立場。在金融合作方面，東協各國亦在 1977 年簽訂「東協換匯安排」（ASEAN Swap Arrangement），要求各成員國捐款一定數額（兩千萬美元以下），目的在於提供各國國際收支不平衡時之緊急支援（王士录、王國平，1998）。

此外，東協和諧宣言及 1977 年之後所簽訂的各種經貿合作計畫，無非是希望透過東協內部的經濟聯合，而能吸引國外資金與技術之投注，使出口導向工業化之策略得以落實，並加強東協各國之經濟力量，度過全球經濟危機。尤其石油危機導致已開發國家經濟衰退，對於發展中國家之經援與投資亦減少，尤其世界性的貿易保護主義日漸抬頭，種種非關稅限制、配額與國家對市場運作介入程度的增加，對於較晚發展出口導向工業之東協國家非常不利，因此東協國家便希望藉由團結各國力量、透過集體行動進行談判，來獲得已開發國家不爲貿易設限的保證，或是爭取外國資金與技術援助。此種透過小國團結以增強談判實力的方式，在 1977 年東協第二次高峰會會後與日本、紐西蘭、澳洲三國首長會談時，已獲至初步的成功（林庭芳，2003：23）。

雖然 1961 年之東南亞協會是因區域經濟合作之目的而成立，但是其因具有濃厚親西方及資本主義市場之色彩，受到當時親共的印尼排斥，遂拒絕參加。也

就是說，雖然經濟合作為東南亞協會成立之主要目的，但是除了經濟因素外的其他因素如：政治因素，也可能因影響著東南亞協會的組成進而影響它未來的動向。以東南亞協會三個成員國（菲律賓、泰國、馬來西亞）來看，在經濟上，仍處於「殖民地格局」，輸出以農礦原料等為主。以 1962 年為例，農礦產品佔菲、泰、馬三國輸出額比例，分別為 95.06%、96.68%、60.73%（研考會，1984：82-86）。在政治上，菲、泰、馬三國均為反共國家，馬來西亞在獨立後加入大英國協之一員，泰、菲且為美國圍堵政策中「東南亞公約組織」之參加國。而大英國協及東南亞公約組織在兩極對立之全球冷戰體系中，皆為自由世界陣營的一方，因此泰、菲、馬三國均仰仗西方國家安全傘之保護，政治立場相似（陳怡萍，1993：34-35）。



然有論者認為 1967 年東協之成立，並非全然基於經濟社會合作之宗旨，其隱藏的目的實係作為一個政治同盟或軍事聯防組織。任何國際跨國組織的成立，都是國際政治舞臺上的大事，而東協成立之際，創立五國之間又多少互有領土主權、邊界糾紛、政策對立等新仇舊恨，各國願意放下爭議組跨國區域組織，顯示東協確有政治合作與區域安全上的考慮（Djiwandono，1988）。

冷戰的兩大陣營對立，給予東協一個存在的理由，但是這也同時形塑了東協欠缺中心思想的性格。尼克森主義，讓美國在東南亞的參與暫時退居二線，改以間接而非直接的接觸。與其說這是美國主動採取的東亞政策方向，不如說是來自越戰的失利與美國國內高漲的反戰民意所驅使，讓美國在不願離開東南亞的情況下，被動地退出東南亞舞臺。在美國缺席於東南亞的同時，東協的成立給予東南亞表面權力真空的狀態，這也迫使東南亞親美諸國必須要擁有特定的集體行動的架構。

同時，正如冷戰時期存在於全球各處，由美國政府所力挺的威權政府一般，共產主義也提供了東協國家內部政權統治的正當性。由於恐懼共產主義與共產黨

所可能帶來的動亂、不安、與經濟權力的奪取，泰國、馬來西亞、印尼與新加坡都成功地讓企業與統合主義主導國家。也因為共產主義者與游擊隊於 50 與 60 年代在東協國家內部造成的動盪和種族衝突，讓這些親美的東協國家得以在國內施以嚴厲的鐵腕政策。以中國暗中支持的共產主義叛亂行動最直接展現的例子莫過於 1965 年的 930 事件。該年 9 月 30 日晚，數名印尼將領遭暗殺，事後軍隊右翼人士指出該暗殺行動為共產黨所為，親共的蘇卡諾總理被右翼的蘇哈托替代（Anwar，1998：15-17）。類似的事件在這個時期層出不窮，這都加深了東協國家對中國的不信任。恐共情結從越戰一直到 70 年代為止，蔓延著整個東南亞。在泰國，共產主義的威脅正當化了王室統治，而佛教信仰也得以成為統一全國的共通價值（Jackson，1989）。在印尼，在 1965 年到 66 年間，蘇卡諾到蘇哈托的血腥政權轉移過程也讓軍事領袖們領悟到維持社會秩序安定的重要。在新加坡也一樣，總統李光耀也提及，1964 年的種族暴動與 1965 年新加坡被大馬聯邦的逐出等等動盪因素，合理化了司法部門、立法部門與社運部門的壓制與極小化。

在這樣共同宣傳並認定外來的共黨威脅，與內部各種社會衝突的因素（當然還是與共產黨有關），不論是種族紛爭或與它國的衝突，比方馬來西亞與印尼在 1963 年到 66 年的軍事衝突 *Konfrontasi*，都造就了東協國家對一黨獨大或獨裁統治的威權體制的友善環境。這樣的發展也影響日後被讚譽有佳的「東協模式」。也就是將東協保持在一個純商業貿易平臺，並且強調擱置爭議，尤其是不干涉它國內政。因為幾乎每個東協國家的政府都有個不特別光彩的威權統治，這讓東協國家巧合地都不樂見任何來自外界的批判與對自身統治正當性的質疑

（Acharya，1998：70）。這恐怕才是「東協模式」中「尊重彼此差異」一些地區邊界上也還有很大的爭議，東協基於反共的目標存在，但彼此合作並建構一個多邊安全機制是非常困難的。

東協的成立與東協國家的政權，很大部份原因可說來自於中國與大陸東南亞

的共產主義勢力的外部威脅推引。在 1992 年，新加坡外長羅佳南 (S. Rajartnam) 回憶在 1967 年東協成立時的情景說道：「想起當時在開第一次東協首長會議時，我們必須要寫出我們的聯合聲明，那是個非常困難的問題，因為我們必須在文章裡寫整整十頁無關痛癢，沒有主題的東西…我們自己雖然是開啓東南亞國家協會的人，但我們自己都不太清楚到底東協要往哪裡走，或是到底能不能走到哪裡？」 (Business Times, 1992) 也因此冷戰結束後，東協喪失了其核心的反共目標，於是東協國家的政權皆開始鼓吹各種不同的新價值、新目標來遞補這個空缺的「東協思想」。也因此，在 80 年代，印尼總理蘇哈托提倡印尼新秩序的五原則 (Pancasila)，新加坡以儒家思想與「亞洲價值」，試圖推廣為迫切的教育與政治方針，在馬來西亞，則有馬來全國聯合組織 (United Malay National Organization, UMNO) 提出以歷史上的 Malacca Sultanate 王權時期的思想 (rukun negara) 來重拾大馬來西亞精神與思想，並以此做為總理馬哈迪的執政的思想基礎 (Martin Jones and Smith, 2006: 46)。

第三節 中國經濟改革及對東協的和解

中國在 1971 年正式加入聯合國，並於 1972 年與 1979 年與日本、美國建交，在 70 年代中國與東協的關係走入了新的階段。在對美改善關係的同時，中國也開始積極對東協與其他尚未加入東協的大陸東南亞國家改善關係，才足以緩和緊張的邊境關係，並突破安全與外交被包圍的困境 (Yahuda, 1996: 197-201)。中國與泰國於 1973 年改善，於 1975 年正常化。泰國由過往的親美反共立場改為獨立不結盟。馬來西亞是自尼克森提出「和解政策」後第一個承認中國的協國家，雙方並於 1974 年建交。雖然如此，種族問題與支持馬共仍是雙方的爭執點，尤其在馬哈地執政前期，在強烈的馬來人主義下，對於中國的態度也相當不友善，直到 1985 年 11 月馬哈地訪問中國，簽署「投資貿易協定」與「避免雙重課稅」

協議，1988 年雙邊也簽訂了貿易協定，雙邊實質關係才有所改善（宋鎮照，1999：81）。此外，菲律賓也跟隨美國對中國立場的轉變而改為友好政策，於 1975 年和中國建交，印尼及新加坡雖未與中共建交但是雙方關係已沒有之前緊張。至此，中國與東協國家的外交關係不僅正常化，也開啓了雙邊實質經貿利益與關係。

鄧小平主政以後，於 1978 年召開的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上提出的力主「改革開放」的方向，中國頓時從毛澤東時代的內無內債，外無外債的經濟政策，改為部份性的開放，廣東省深圳、珠海、汕頭及福建省廈門四個地區被改為對外經濟特區，積極發展對外貿易。在經濟特區的試驗成功後，中國又再開放其他 14 個城市，由此開始，對外貿易成爲中國經濟成長率的引擎。中國對外發展的政策目標是藉由開放沿海的港口與島嶼，引進外資讓沿海地帶區域發展之後，再帶動其他較爲落後的內陸地區發展。但是，在開啓對外開放時，中國無法將國內外的資源、市場與經濟發展作有效的整合與運用，於是改採以「兩頭在外，大進大出」的「國際大循環」概念，將發展主軸定位在先透過國際分工與國際競爭，以尋求新的經濟發展動力，再藉由沿海地區經濟的發展，帶動與結合內陸落後區域的發展，達成「完整產業體系」與「均衡區域發展」之「兩個傾斜」的政策目標（李文志，1996）。

東亞的經濟版圖從 1970 年代初期至 1980 年代中期，基本上仍延續垂直分工的關係，但由於積極推動出口導向的新興工業國家逐漸興起，因此先進國家和新興國家出現部份水平分工關係；到了 1980 年代中期至 1990 年代，東亞各國產業間水平分工關係持續擴增，三級分工模式逐漸出現垂直、水平兼具的複合式分工關係，在 80 年代末期東協國經濟快速成長，中國在 92 年實施二次經改後經濟成長徒增，東亞各國的產業分工關係逐漸形成以美國、日本、亞洲新興工業國、東協與中國間的菱形分工模式（蕭全政，2001b）

隨著中國經濟的改革與開始融入國際經貿體系的運作，中國的東亞政策也隨之改變。自1979年鄧小平推動改革開放，確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與外向型經濟發展策略的總方針後，中國以大陸戰爭為主的軍事戰略，也隨著1984年開放沿海經濟特區，與1985年確立「和平發展是當前世界的主流」，逐漸從大陸轉向對海洋的佈局。為了確立其海權的建立，中國更於1989年提出的「近海積極防禦」（Active Offshore Defense）戰略，並陸續裁軍百萬與撤消昆明、武漢和新疆等內地軍區，可說是中國整體國家發展目標重心轉移到海洋的轉折點（李文志，1996）。

在這個背景之下，中國對海洋東協國家的策略就不再只是友善而已，而是更積極地開拓對東協的經貿往來，因此更進一步努力將中國—東協關係正常化，最終在1991年成功地對東協所有國家建立或恢復外交關係。

在1989年爆發的「天安門事件」，則是另一個重要轉折點。中國在1989年6月4日於北京天安門前以武力屠殺在場的示威人士，這引起國際社會的嘩然，並導致西方世界對中國採取經濟制裁，封鎖對中國的貿易。在初步見有成果的對外貿易的經濟發展，在此時此刻的經濟封鎖，對中國的傷害不小。隨即發生的柏林圍牆倒塌與蘇聯的垮臺，冷戰的終結也讓東南亞區域出現了權力真空的情境。這都給予中國與東協雙方造成了開啓更進一步經貿談判與合作的誘因。冷戰的終結意味著東協的存在目的再度成爲疑問，而除了反共的目標以外，東協似乎也只剩下不特別有力的經貿協商平臺的功能。東協於是需要在新的時代找尋自我的存在價值，而亟需開拓對外經貿關係的中國，就成爲了東協絕佳的對話夥伴。這一個歷史轉折，也預見了在90年代中國與東協國家整合的加溫。

第四節 小結

從冷戰終結開始，中國與東協國家分別被納入不同的陣營中，雙方往來並不頻繁。中國在冷戰中的東亞政策起先跟隨著蘇聯的步伐而前進，但很快的，中國整體外交的主軸就浮現出來，那不見得是與蘇聯同步的，那就是中國需要平定邊境的紛爭。不論是韓戰中對中國東北區域安全的威脅，亦或是對臺的砲戰，還是日後對印度支那半島的政策，都顯示出這個時期的中國追求的是國家生存與安全。在這時候的東南亞國家則苦於處理國家內部的共黨鬥爭，也因此對中國採取非常敵對的態度。但是在這個時期的大陸東南亞，也就是印度支那半島的三國（不包涵親美的泰國）而言，中國已經對其採取了一定程度的影響。雖然越南因為親蘇而與中國交惡，但這也只是讓中國對大陸東南亞的控制的努力更為明顯。而在這時期，東協的五國全都是海洋東南亞國家，彼此卻存有相當多的歧見，爲了如此，東協採行了「擱置爭議」的模式，這也造成日後東協無法有效執行其他區域整合組織所有的功能，這個「東協模式」機制的實行，將進一步形塑出東協的樣貌。

在中國逐漸踏入國際社會後，與東協國家的關係也開始解凍，雙方的交流在1989年之後達到高峰，雙方都需要更廣泛的交流與經貿往來。

第三章 後冷戰時代的交流與合作，1990-1997

第一節 美國新圍堵政策下的東亞

在冷戰終結後，蘇聯瓦解，美國駐守東亞的海、空軍也自菲律賓撤離，美國與蘇聯的兩大勢力正式撤出亞太地區，這也造成了「權力真空」。冷戰時代的結束也意味著亞太局勢的重整，中國則因為 80 年代的一連串經濟改革措施，對外貿易對中國經濟發展逐漸顯出其重要性與必要性，因此也利用這個「權力真空」的機會，擴張軍備與對外發展，將軍事與貿易的觸角伸向太平洋。但是這樣的大動作引起美國的強烈關注，再加上冷戰後美國不再擁有假想敵之故，對美國的右派所主張的大規模軍事佈署產生極大的壓力。同時，中國對海洋的擴張確實造成美國於太平洋主控權有挑戰的可能，因此被美國視為新的潛在敵手。

1990 年代初，中國在東亞的作為並不內斂，除了軍備擴張外，還並因南海領土（Spratly Islands）的爭議，於 1995 年與菲律賓發生了武力衝突，並隨之佔領美濟礁；1995-96 年之際，又因臺灣舉行第一次總統民選，對臺進行飛彈軍事演習，這一連串的事件，使美國更加確認中國是亞太區域不穩定之潛在因素，為了確保在亞太地區之主導權與利益，美國與日本於 1997 年簽訂「美日防衛合作方針」，擴大美日在亞太區域的戰略合作，並且以此作為對中國進行「戰略圍堵」的核心。在此同時，從美國學界，日本學界都開始出現認為中國將成為下一個挑戰美國獨霸的新霸權的「中國威脅論」的論述，中國因為「中國威脅論」。對中國在區域中產生不穩定因素，甚或更久以前，對中國在區域中獨霸的歷史並不陌生的亞太諸國家，更加深了對中國的疑慮與恐懼。因為，中國自 1978 年之後對東南亞的友善作為來得突然，並且從沒有人知道，中國的「睦鄰」政策的實際目標為何，這種對未知的猜疑心理，再加上來自西方世界的權威性詮釋，讓「中國

威脅論」成爲普遍存於亞太各國的共識。

「中國威脅論」對中國國家的整體發展自然是不利的，尤其在天安門事件之後，中國正苦於被歐美國家的經濟封鎖，外在的壓力對改革開放才十餘年的中國來說，威脅性不亞於來自國內保守派對改革開放政策的反對。爲突破這個困局，中國努力開拓對東南亞的經貿外交來緩和國際間「中國威脅論」的疑慮，以創造對中國國家發展有利之平和週邊環境。

1992年9月，美國海軍太平洋艦隊司令拉森上將，在夏威夷就亞洲安全問題提出了「中國威脅論」的新論點，他指出南海將會成爲亞洲下一個戰爭熱點。此論一出，立即在國際社會激起極大的反響（文馨，1995：67）。亞太各國更爲中共綜合國力日益強大感到憂心忡忡。「中國威脅論」簡而言之，就是認爲中國的經濟發展會導致軍事實力增強，從而對週邊國家及亞洲乃至整個世界的安全穩定構成威脅（王麗娟，1999：36）。

1995年美國的「圍堵中國論」出現後，有系統的逐漸塑造「中國威脅論」之產生。美國右翼保守派學者與媒體開啓了「中國威脅論」在美國的討論，而學界也有相關的著作讓這樣的論述有所依據，比如杭廷頓（Samuel P. Huntington）在1996年所著之《文明衝突及世界秩序再造》（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還有柏恩斯坦（Richard Bernstein）及芒羅（Rose H. Munro）合著之《即將到來的中美衝突》（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等。

芒羅（Ross H. Munroe）於1992年撰文指出「亞洲真正的危險來自中國」，中國的經濟迅速發展影響美國經濟利益，另外，中國可能成爲軍事大國也影響美國的安全，並宣稱中國在二十一世紀將主導世界，是美國的競爭對手而非戰略夥伴。在1993年美國學者杭廷頓也提出「文明的衝突」，指出西方文明的兩大對手：

一是以中國為中心的儒家文明，另一是伊斯蘭文明，並指出共同的文化是經濟整合的先決條件，中國、香港、臺灣、新加坡、及其他華人社會的亞洲國家間的經濟關係逐漸擴展，未來東亞的經濟集團將會以中國為中心。

美國對「中國威脅論」的推論可歸納如下：首先，中國已是全球高度軍備國家，常備軍已高達 300 萬人。其次，中國擁有 5000 架戰鬥機和 300 顆核子彈頭，穩居世界第三大軍事強權。第三，雖然中國的國內生產毛額僅為美國的 44%，然而專家認為，中國在未來的經濟成長將維持 8%至 10%之間，而美國乃滯留在 2.3%左右。第四，如果中國每年的國防預算以 10%成長，而美國持續進行減少支出，則中國國防預算將在 2012 年超越美國。尤有進者，中國的核武瞄準美國以及出售大規模毀滅性武器至利比亞、伊朗和伊拉克，皆證明中國對美國安全的直接與間接威脅（張亞中、孫國祥，1999：86-87）。相對的也威脅到美國在亞太地區政治、經濟、軍事及戰略之利益。

在布希政府期間，美國開始重整後冷戰時代的對外關係，以在新的國際環境下有新的佈局與規劃。布希政府的國務卿貝克（J. Baker）於 1991 年在《外交事務》發表一篇闡述後冷戰美國的亞太政策的文章。貝克說明了環亞太區域對美國的重要性日漸於大過歐洲，並且全球已發展出新的格局，先是共產集團的瓦解，部分國家開始民主化、自由化，然後全球經濟整合也開始起步。但國際毒品、環境生態、及非法移民問題日趨嚴重。世界各地族群問題、民族主義抬頭、領土爭議不斷。貝克認為新的國家安全必須納入這些問題。

1980 年代後期東亞與美國的貿易額也超過美國對拉丁美洲國家，與共產國家經濟相比，更是值得肯定。在日本的雁行模式帶領之下，東亞四小龍的經濟成長快速。臺灣、菲律賓與南韓都開始民主化。柬埔寨問題和平解決，朝鮮半島的核武威脅加深，民主在中國及緬甸中挫，日蘇因北方領土問題依然緊張。貝克指

出美國基於地緣政治的平衡在亞太的新角色是「公正中介人」，制約亞太區域的不穩定。而美國維持亞太穩定繁榮的三個支柱是：一、全球貿易整合，建立自由貿易的架構。二、提升經濟活力、促進民主化，使之成為亞太地區的共同價值，養成共同體意識，避免非民主國家的冒險行徑以維持亞太地區和平穩定。三、更新亞太區域的安全架構。(Baker, 1991: 1-3)

另外，貝克也指出，美國自其勢力來到東亞，長期以來所強調的經貿與地緣政治的策略為下：在經貿上，強調東亞的「門戶開放」；在地緣政治上，則強調權力平衡。以此為基本原則，貝克接著分經貿與軍事安全兩方面談論美國的亞太政策：在經貿方面，搭配亞太經濟合作會議（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共同經濟利益的功能，面對後冷戰亞太局勢的挑戰。另外，促成亞太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在軍事方面，最重要是以雙邊防禦條約為架構的扇形戰略，以美國為中心，持續維持與南韓、日本、泰國、菲律賓、澳洲的雙邊防禦條約，作為扇骨，其中以美韓、美日、美澳最為重要。不過貝克也提出，由於亞太的歷史與安全環境與歐洲不同，過渡鼓吹多邊安全合作機制將引起東亞國家緊張。不過，貝克採取比較樂觀的觀點，認為透過與東亞國家通訊及通商將改變東亞國家的政治與經濟特質，並指出市場經濟自然會伴隨著政治多元主義。並且，政治的多元主義所形塑的民主政體會使國際環境較為和平：民主國家之間極少會輕易發生戰爭。即使亞洲文化具有特殊性，並且有人主張民主政體不適合亞洲文化或亞洲傳統，貝克認為經濟成長自然會導致民主化。貝克強調亞太經合會是經濟整合與貿易自由化的載具，而不只是區域經濟集團。而更重要的是美國為了促成減少市場障礙與支持開放與競爭的貿易體系，積極地參與關稅暨貿易總協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 GATT）烏拉圭回合談判（Baker, 1991: 4-8）。

在貝克這篇文章中，特別談論美國與日本、南韓、澳洲與東南亞地區的關係呈現出布希政府的亞太政策是以雙邊關係為主，APEC 為輔。布希政府的政策架

構延續冷戰時期軍事圍堵的各個雙邊架構，在後冷戰時期，以推動政治民主化，經濟自由化來配合。這樣的戰略架構上，在一定程度上維持了冷戰「圍堵政策」的架構。美國透過在全球層次推動 GATT 烏拉圭回合談判完成，希望能經由自由貿易促成民主化的擴散，使民主成爲全球共同價值，樂觀地認爲，民主的共識能帶來和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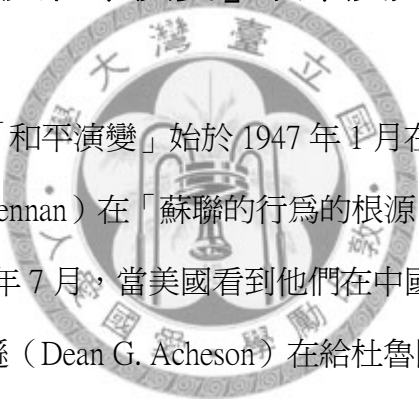
「介入」與「圍堵」是美國朝野在討論此政策時，最常被提及的兩大主張。共和黨佔多數的國會傾向「圍堵」的主張，而民主黨政府則堅持「介入」的作法；不過，政府中又因不同的業務立場而有所差異，國務院爲主的外交系統一直是主張「介入」；另一以國防部爲主的系統，則因直接涉及軍事戰略的布局與武器輸出，而偏向「圍堵」的觀點（李文志，1996：13）。

從形式上來看美國亞太戰略整體的布局，結合經濟開放與戰略圍堵的觀點是比較符合美國的戰略目標，亦即，將中共整合進世界資本主義體系之際，也必須維持優勢的嚇阻武力與聯盟關係，才能在汲取中國大陸市場利益的同時，又能控制中共對全球與區域安全的威脅（李文志，1996：14）。依據柯林頓政府「擴展」的戰略，維持必要的武力以減低國際間「不穩定國家」對全球市場民主體制的傷害，並積極將之整合進以美國爲首的全球市場民主體系，一直是美國對應中共的政策目標。從東亞助理國務卿羅德在 1993 年首次提出「建立新太平洋共同體」十點內容；到 1995 年二月國防部公佈「東亞與太平洋區域安全戰略」報告；以及七月因中共對臺發射導彈，國務卿克里斯多夫前往汶萊參加第二屆 ARF 前，所發表「四個部分的戰略」。美國都在重申同樣的戰略觀：美國在亞太保有優勢的嚇阻武力，特別是，維繫其在亞太地區五個雙邊的軍事聯盟關係，即傳統海洋戰略線的佈署，將是確保亞太區域穩定與和平的基礎，而美國即在此一基礎上推展亞太政策。其中，對中共的政策，就是積極「介入」中國大陸的發展，促使中共的政治開放能趕上經濟的改革，達成「和平演變」中共政權的目標（李文志，

1996：15)。

在美國的新圍堵政策之下，圍堵不再是冷戰時代的軍事面向的產物，還有積極以貿易自由化介入的主軸。以對歐美出口替代貿易為主的東協國家對美國的全球佈局策略是歡迎的。但是不論是硬性的圍堵或是軟性的介入，中國都倍感威脅，因為新圍堵政策思想就是針對「中國威脅論」而來。

第二節 中國的「反和平演變」政策及與東協雙邊關係的發展



美國對共產國家之「和平演變」始於1947年1月在蘇聯任美國大使館代辦喬治·凱南（George F. Kennan）在「蘇聯的行為的根源」一文中曾經提及，然而最為人所熟知的為在1949年7月，當美國看到他們在中國的策略遭遇到失敗命運時，當時的國務卿艾奇遜（Dean G. Acheson）在給杜魯門（Harry S. Truman）總統的一封信中就提出用「和平演變」來對付新中國。他說：「中國國內已達到一種定局」，但「他們仍舊相信，中國的悠久文明和民主的個人主義終將再度勝利，中國將推翻外來制度。我認為我們應當在中國鼓勵現在或將來能促進上述目標的一切發展。」

1978年底以來，鄧小平的改革策略，事實上具有「反和平演變」的戰略意義，即一方面讓中共能藉對外開放以吸納和平演變者所可能帶來的經濟資源和經濟機會（包括資金、技術、貸款、人才與市場等），另一方面則以對外開放引導內部體制改革（包括金融、貿易、財政、產權與供銷體制等），而鞏固「具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之主體，並以之對抗「和平演變」的壓力（蕭全政，2004：15）。

面對和平演變的壓力，改革派鄧小平受到黨內保守派的猛烈批判，於 1992 年初南巡沿海經濟區之行，重新確立開放改革的路線，紛爭才告平息，期間鄧小平曾指出：「在這短短的十幾年內，我們國家發展得這麼快，使人民高興，世界矚目，這就足以證明三中全會以來路線、方針、政策的正確性，誰想變也變不了。說過去說過來，就是一句話，堅持這個路線、方針、政策不變（鄧小平，1993：371）。」

「和平演變」可說是新圍堵策略中「介入」的化身，而這對中國造成內外的壓力是很大的。有鑒於此，在 1993 年 11 月「十四大三中」前夕，中國國家計劃委員會提出「三個三角」戰略。透過大、中、小等三個「三角」，中國希望能掌握「小三角」、爭取「中三角」，以便與「大三角」周旋；其中，「小三角」即涉及中國與港台的統一，「中三角」涉及中國對東協國家和亞洲四小龍的拉攏，而「大三角」則涉及中共與美、日之間的爭鬥（李文志，1997：251-252）。很明顯的，「三個三角」戰略，完全是在配合以海洋勢力和大陸勢力交鋒地帶為重點的「反和平演變」，而希望在「和平演變」的壓力下，使中共能從東向和南向中，找到美、日包圍下的緩衝地或突破口（蕭全政，2004：17）。

在小三角的部份，中國對臺灣的統戰策略開始馬不停蹄行進著，而中三角與大三角也同時進行著。其中，東協國家與其他東南亞國家的部份，就是屬於中三角的一環。中國於是開始積極回應一直以來受到國家之間對立而受阻礙的次區域開發計劃，「泛亞鐵路計畫」與「大湄公河區域合作計畫」就是在這個背景下開啓。如果我們能夠從三個三角的戰略來理解中國對東南亞在次區域發展計劃中的作為，便不難掌握在這些密集的協商與倡議中，中國的核心關懷與戰略主軸為何。

「泛亞鐵路計畫」是聯合國亞太經社委員會 1967 年即倡議的開發計劃，原先

是計劃由亞洲開發銀行聯同地區性經濟組織及國際機構的援助下，集合其他亞洲國家的資源集體合作開發的跨區域開發計畫，但是這就如聯合國的眾多理想性倡議一般，在現實的情況下無法實行而看似無疾而終。因為冷戰期間東亞處於壁壘分明的東西對抗局勢之中，這一個需要在印度支那半島與中國南方橫越多個不同陣營國家的興建計劃就不了了之。但在冷戰結束後，1992年8月，湄公河流域國家透過亞洲開發銀行的協調，開始著手範圍涵蓋貿易、投資、運輸、人力資源、能源開發與環境保護等領域的次區域經濟合作計畫。中國積極參與東南亞事務，意願與資源都看似有所準備，加上多個國家採取經貿全球化的策略，讓在這個區域內的國家對於跨國的運輸網絡有了不同以往的需求，越南、寮國、緬甸、柬埔寨也先後準備加入東協，帶給「泛亞鐵路計畫」重起爐灶的機會。

東協也採取主動，對中國全力發展經貿關係並展開次區域合作計畫，如推動興建「泛亞鐵路計畫」及「大湄公河區域合作計畫」，此計畫同時有利於中國西南部與中南半島國家的發展。



馬來西亞總理在1996年亞歐高峰會重提泛亞國際鐵路興建計畫，計畫興起從新加坡經由馬來西亞的吉隆坡，泰國的曼谷、清邁，緬甸的仰光，柬埔寨的波貝、詩梳鳳、金邊，越南的胡志明市、河內，進入中國的昆明到北京連接目前亞歐鐵路線，建立東南亞、東北亞和歐洲之間的鐵道網。東南亞國家及中國大陸於是在吉隆坡舉行第一次泛亞鐵路興建工作研商會議，各國均表示出肯定與支持的立場。與此同時，中國也同意配合東協展開的「泛亞鐵路計畫」工作，完成了「雲南省對外鐵路新通道規劃方案」等，並與寮國、越南簽署政府間雙邊汽車運輸協定；開放由昆明通往曼谷、新加坡、萬象等國際空港。中國與泰國簽訂「關於泰王國從中國購電諒解備忘錄」，在2017年向泰國輸電300萬千瓦(宋帕婉，2007)，中國大陸還向湄公河開發委會各成員國提供上游汛情預報；並與次區域各國簽署「農業合作諒解備忘錄」。

中國出資設立了「東協－中國合作基金」，並與亞銀合作開展有關研究合作專案；此外，中國還先後與這個區域的相關國家簽署一系列禁毒行動計劃；中國與寮國、緬甸、越南在邊境實行了旅遊方面的互免簽證，對第三國旅遊者也提供過境便利。從冷戰期間的東協發展性質來看，可以說經濟的性質大於政治上的性質。雖然東協最初的成立目的在有效控制區域內的衝突，以及聯合區域內各國來對抗外國勢力，發展重心卻在經濟與社會（金榮勇，2001：54-56）。

儘快打通各國邊境之間的斷頭路已經形成了共識。東協 10 國中，處於印度支那半島的國家有 7 個，分別為越南、寮國、柬埔寨、緬甸、泰國、馬來西亞和新加坡，中國也規劃建設從南寧到中越邊境友誼關的高速公路以及從昆明到泰國首都曼谷的公路，將可以將中國內部的公路網絡與印支半島的公路網絡連結起來。另外，在鐵路方面，泛亞鐵路線路方案已定，其走向新加坡－吉隆坡－曼谷－金邊－胡志明市－河內－昆明、南寧，除金邊－胡志明市段有 200 多公里需修建外，其餘已有現成鐵路。航運方面，廣西北部灣沿海的防城港、欽州港、北海港，是中國通往東南亞各國運距最近的港口群，中國還計劃在 5 年內擴大各港口的投資規模，將現有的總吞吐能力 1850 萬噸提高到 3050 萬噸（林友順，2006）。此外，流經中國西南部和印支半島的湄公河航道的疏通也正在協商中。航空方面，南寧、桂林、昆明是中國到東南亞各國距離最近的國際空港，新開和加開該等空港與東協各大城市之班的航班正在籌劃當中，交通運輸成爲建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過程中充分發揮其基礎建設支撐作用。該計劃已經於 2006 動工，預計將會在 2015 年完工。

隨著中國與東協合作進程的逐步展開，地處於中國西南部的廣西、雲南，由邊陲地帶轉變成印支半島區域的樞紐。打造連結中國西南部與東南亞的交通網絡，最顯著的效應就是減少東協國家與中國之間彼此物資運輸的成本和時間，提

高物流速度和規模，帶動資源利用率，讓中國的西南部和東協國家的貿易物流增加發展的便捷。中國廣西東興、憑祥、水口以及雲南河口、瑞麗等邊境口岸進出境人口快速增加。廣西、雲南邊境口岸也成爲中國與東協貨物進出的主要通道，四川、重慶、廣西、雲南等中國西南部省區的出口貨物有一半經由該等口岸流向東協國家。1996 年第一屆的東協非正式高峰會，各成員國同意柬埔寨、寮國、緬甸同時加入東協，並達成共識支持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1997 年在第一屆「東協－中國高峰會」的聯合聲明上，雙邊同意共同開發湄公河流域，促進次區域的經貿、旅遊和運輸等活動。

中國更具體指出願意支持加強湄公河地區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礎設施和人力資源開發，並希望日本與南韓能夠共同合作推動湄公河流域開發計畫。東協亦公開指出，東協和中國大陸在旅遊、農業、資訊科技、運輸及人力資源開發方面充滿合作的潛力。湄公河次區域地域範圍包括湄公河沿岸柬埔寨、寮國、緬甸、越南和中國雲南省。湄公河次區域合作組織（Greater Mekong Sub-region, GMS）是 1992 年由亞洲開發銀行所發起的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等機制，中國在 15 年來大湄公河次區域合作、東協－湄公河流域開發合作等機制中，發揮重要的作用。1994 年，中國成立「國家瀾滄江－湄公河流域開發前期研究協調組」。1997 年，江澤民與東協領導人發表聯合聲明，確認在開發湄公河盆地方面雙方有共同的利益，承諾通過促進貿易、旅遊和運輸領域的活動，加強對沿岸國家的支持。

第三節 東協的內部整合與對中國友善關係的發展

新加坡駐美大使許通美於1991年表示，決定東協未來發展有四個決定性的因素：第一，在柬埔寨問題解決之後，東協必須有新的目標；第二、必須要成立自由貿易區以刺激出新的發展；第三、東協是否能主導並建立區域的新秩序，比如印度支那半島國家的關係；第四、在亞太地區建立政治及安全的機制。

這顯示出了東協國家的內部整合尚未有所成就，尤其在東協的走向方面還是不夠清楚的。但是東協作為一個存在的組織，卻也不斷地在透過會員國家的固定會談與倡議，自我改造，並在其中逐漸形塑東協的目標。如果中國的經濟改革開放是一連串的經濟實驗工程，如鄧小平所說的「摸石頭過河」，東協的內部整合以至整體走向，也一樣在摸石頭過路。雖然不見得知道要往哪裡走，但實際上的步伐卻也不會停歇過。

1992 年東協召開第四屆東協高峰會以因應冷戰結束後國際政經局勢的變遷，一致通過「新加坡宣言」（Singapore Declaration），確立了東協於後冷戰時代一個新的發展策略。東協自由貿易區是東協國家在邁向後冷戰世界的第一步。透過建立東協自由貿易區，東協將從單純處理成員國間的政治問題而走向經濟整合，另外也開始為了促進區域安全建立東協區域論壇，將政治及安全納入議題。泰國總理阿南明確的指出「新加坡宣言」和促進東協經濟合作架構協定

（Framework Agreement on Enhancing ASEAN Economic Cooperation），是未來東協發展的方向，東協發展至此進入新領域，從政治合作走向經濟合作的領域。雖然東協區域論壇的設置將過往東協的功能一分為二，各司其職。但是也這個安排之下，東協將安全與政治的相關問題的合作與對話都切割在東協之外，這給予東協更大的彈性空間來進行更密集的对談與合作，因為只要在東協區域論壇以外

的東協會議上，安全與政治問題將不被提及。但也因為這個安排，本來就不具有太多政治約束力的東協，在去政治化後，更萎縮成純經貿性的機制，造成日後東協在政治共同體上的整合必存在一定的漏洞。

去政治化的東協，也因此歡迎過往與東協在政治上壁壘分明的柬埔寨、寮國、緬甸三國領導人，在1995年參加東協第五屆高峰會，曼谷高峰會宣言（Bangkok Summit Declaration）對東協的發展達成共識，在進入二十一世紀之前將東南亞十國納入東協，並繼續推動東亞核心會議。泰國總理在會中表示柬埔寨等三國加入東協後，東南亞國家團結在東協下將可以「掌控自己的未來」，馬哈迪同時指出東協擴大後將擁有經濟和政治的潛力，決定自己的發展方向，所以東協應儘速達成一體化（賀聖達，2000：10）。

一般認為中國的崛起將會採取擴張政策，對周邊國家產生威脅，因此對中國應當採取介入與交往的政策，將中國納入世界經濟體系及區域性組織，使中國成為國際社會中的一份子，以要求其遵守國際社會的遊戲規則，而只要可以成功地幫助中國導入國際社會中，中國就得以被國際社會的常規所約束。反對的說法則認為可以藉大國勢力維持亞洲權力均衡，事實上，東協兩者兼備，既與中國有在國際層面上的架構，比如日後的「東協+1」的組織機制，同時也未曾放棄與美方和日方的經貿與安全合作。但是不論如何，在面對崛起的中國的時，當時的東協國家意見仍不一致，馬哈迪認為崛起的中國是東亞的隱憂，因為中國軍備的現代化將會引起日本跟進，這是引發東亞區域緊張的根源，主張採取建設性的交往，希望與中國在共同利益上與共同關切的事項交換意見。對於東協國家來說，它們最不願意見到的，就是來自於東北亞區域內的不穩定，因為那將會牽動整個海權與陸權彼此間權力的失衡，並且，這些東協國家必須因此而被迫選擇投入某一勢力或陣營，而破壞國際秩序。

新加坡代表也指出東亞地區的發展將影響整個亞太地區的穩定和全球經濟，中國基於國內經濟建設，不致於破壞區域內的和平和穩定。李光耀也指出，中國人民對「亂」有恐懼感，因為中國地廣人多，領導人採行政策之前會謹慎，將中國納入世界體系是避免中國威脅最好的方式（陳欣之，1996：29-30）。在這個名目下，東協積極將中國納入國際組織或區域組織，如1990年新加坡亞太經合會部長會議聯合聲明支持中國加入（The Asia 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並指出中國的加入有助於亞太區域經濟繁榮。亦於1997年東協－中國領導人會議雙方發表聯合聲明中，重申支持中國加入WTO。

東協於1991年7月首次邀請中國參加東協外長會議，東協和中國關係開始正式接軌，當時朱鎔基指出增進中國和東協在共同利益上的合作就是中國的利益所在。對此，東協在1993年作出回應，雙方同意就相關於共同的政治和安全利益的議題於高層官員會議中進行協商，並且同意經貿與科技的合作，成立經貿合作及科技合作委員會。一直到1996年，中國正式成為東協外長會議對話夥伴（ASEAN China Dialogue），開始了東協和中國正式關係。

東協也曾經試圖主導區域安全，在1992年東協高峰會議上各國代表同意建立亞太多邊安全對話機制。於兩年後在曼谷召開第一屆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加強區域安全及政治對話，主要有建立亞太區域安全信任措施、防止核子武器擴散、和平維持、交換非機密性軍事情報、海域安全、預防性外交等六項議題，主要作用是藉著亞太國家建設性對話，以此建立互信及預防區域衝突。但是東協區域論壇卻沒有強制性的執行或仲裁權力，因此，區域間的安全對話沒有發揮很大的安全效能。在1999年舉行的東帝汶獨立公投時，更無能處理印尼軍隊對當地居民的屠殺事件。

區域安全論壇也將中國納入安全對話夥伴，其中主要的因素為冷戰結束後亞洲的局勢產生變化，意識型態淡化，必須以「建設性的接觸」增進東協和中國的

瞭解和合作。對中國參與東協區域論壇馬來西亞外長卡默爾表示，若未將中國納入則失去成立意義（王高成，1995：64）。其次，中國的綜合國力日益增強和廣大市場，對東協而言是合作和競爭的契機。再來，東協可以藉中國來制衡其他強權建立亞洲權力均衡，確保東協的安全和利益。這可以說都是試圖以國際機制引中國入甕，以此來限制住中國在東南亞影響力的擴張，是東協在面對日益崛起的中國霸權的因應措施。同時，東協也希望可以利用區域安全論壇的架構，在南海主權爭議上集體與中國開啓對話，並且避免南海發生軍事衝突。東協外長會議在1992年發表東協「南海宣言」（ASEAN Declaration on the South China Sea），強調以「東南亞友好與合作協定」作為解決南海爭端之國際行為準則，以和平的方式解決南海主權爭端。1995年爆發「美濟礁」（Mischief Reef）事件，東協外長會議表示關切，再度發表聲明，極力主張以1992年馬尼拉宣言的精神採取和平方式處理南海問題。從此以後南海問題成為「東協區域論壇」每年討論的焦點議題，主張在這區域建立互信以和平方式、國際法準則及聯合國海洋法公約（United Nations Convention on the Law of the Sea, UNCLOS）、不妨礙船隻在南海海域自由通行原則，並積極商討制定「南海區域行為準則」（The Regional Code of Conduct in the South China Sea）解決南海問題。

後冷戰時期，東協與中國雙方都以發展經濟為最主要的國家任務，就如沙皮（Noordin Sopiee）的觀察，認為亞洲的核武擴張問題和南海主權之爭，都不如發展經濟來得重要，因為導致區域不穩定的主要原因是經濟問題。因此冷戰時期的盟國與敵人分明的界線消失，在後冷戰時期，因著情勢的不同盟友也可能轉變為競爭者，而敵人成為合作夥伴，如東協各國增加對越南的投資，東協和中國也逐漸建立合作夥伴關係。

馬來西亞外長在1996年外長會議聲明，東協和中國都是發展中國家，雙方必須合作維護區域和平與穩定藉以促進經濟成長。雖然東協與中國雙方存在不同

的政治、經濟體制，但不妨礙雙方的友誼和合作。雙方可以透過「東協區域論壇」增進政治和安全領域上的合作，就既有的委員會架構在科技及經貿的領域上深化合作關係。東協公開指出，東協和中國在科技領域上合作已有進程，希望未來能加強生物化學、核能、衛星科技等科技領域的合作，東協和中國在旅遊、農業、資訊科技、運輸及人力資源開發方面充滿合作的潛力。

第四節 小結

冷戰瓦解後的東亞出現的權力真空局勢，讓東協國家自身的組織目標也陷入找尋新發展方向的迷霧中。但是區域經濟與貿易在全球化的挑戰下，也讓東協迅速找到新組織目標，以發展區域內部經貿與科技往來為主。在此同時，中國則在剛得到了改革開放的初步成果後，在天安門事件後受到西方世界的封鎖。在內部反和平演變的與對外擴張的的雙重壓力下，中國必須向南找尋發展的出口。與此同時，原先主宰東亞區域的美國也在冷戰後，將新的競爭對手由蘇聯改為中國，頓時，「中國威脅論」蔓延四處，也因此美國重塑了自身的對中政策。美國與東協都在此時以疏濬中國進入國際經貿組織與國際社會的架構下來面對日益強大的中國。而中國則在身陷「威脅論」的情形下，以更友善的態度來消除東協國家對中國的疑慮。

另外，東協國家也發覺到自身在政治與安全議題上著力不足，開啓東協區域論壇，並在「建設性的接觸」的思維下邀請中國加入區域安全論壇。無奈的是，論壇本身沒有辦法走出東協本身「東協模式」的框架，讓東協在政治與安全上發展不完全。也因此，在日後與中國更密切的整合過程中，東協逐漸失去在東亞事務上的主導權。

第四章 東亞金融危機後的積極整合，1997-2007

第一節 東亞金融危機與中國的抬頭

促使東協與中國從逐漸建立夥伴關係最主要的原因是亞洲金融危機的發生，影響的範圍擴及整個東亞地區，東南亞國家經濟的嚴重受挫，以及中國在此時釋出對東協國家的善意，使的東協重新調整政策，促使東協和中國朝向平等互信的合作夥伴關係發展。1997年夏，整個亞洲都被籠罩在如暴風雨般的金融危機之下。自該年6月起，東南亞各國的貨幣就受到國際外匯投機客的拋售而大跌。以泰國為例，泰銖（Baht）兌美金的比率從1997年6月的24.78：1，貶值到8月1日的31.43：1和9月1日的34.43：1，貶值的幅度高達39%，到1998年1月23日更貶到54.8：1。鄰近的馬來西亞、菲律賓、印尼等國亦受到泰銖貶值的影響，半年多來貶值幅度分別高達44.21%、40%以及81.65%。馬來西亞的馬元（Ringgit），從2.52：1貶到1998年1月23日的4.52：1；印尼盾（Rupiah），也從1997年7月初的2,430：1跌至1998年1月23日的13,250：1。菲律賓的批索（Peso）也滑落約40%。東協各國的貨幣貶值，也讓股票市場受到重創；外資紛紛撤出，更使這些國家的經濟大受打擊（林碧美，2000：4）。

從總體層次來看，一個國家貨幣幣值的高低，大致反應其經濟力的相對強弱（蕭全政，1998：1）。而在東亞金融危機中的東協國家，更是深受其害，政權更迭、社會動亂乃至於經濟緊縮、金融機構倒閉等等慘況，都重挫了東協國家的自信心。但冰凍三尺絕非一日之寒，東協國家會在金融危機中對應不及，實與這些國家的整體發展背景與經貿體質有關。

東協國家透過投資優惠、稅收優惠、出口獎勵等措施，將原來勞動密集型的

進口替代轉變為出口導向，這一策略實施使東協主要國家如泰國、馬來西亞、印尼及菲律賓經濟發展產生快速發展。1990年代後日本因泡沫經濟因素，又東協國家經濟快速發展，自1994年至1996除菲律賓外都在7%以上，東協國家對外出口增加，表示國外對東協國家生產之品需求增加，因此東協國家必須增加投資國內生產資本，但是東協本身除新加坡外，都是資本缺乏的國家。而東亞之日本有大量的外匯，並且在此期間，日幣大幅升值，因此對東協國家投資增加(王仁宏, 1998)。

日本自1990年至1996年對印尼投資累計達92億美元。1990年至1996年對泰國投資累計達57.66億美元。1990年至1996年對新加坡投資累計達55.22 億美元。1990年至1996年對菲律賓投資累計24.062億美元。1990年至1996年對馬來西亞投資累計達45.88億美元，日本對東協5國計投資275.40億美元(蘇顯揚, 1998)。另日本銀行對泰國、印尼、菲律賓3國高達615億美元之貸款，當日本泡沫經濟破滅後與日圓不斷貶值，東協國家外債結構中日圓比例成分隨著增加，造成東協國家的對外負債額度增加，故東協國家為促進出口增加，只有被迫幣值貶值，促進出口增加、進口減少，唯進口減少又造成供需失調，過多的貨幣追求較少的財貨，旋造成物價上漲通貨膨脹，此時外資各國對美元貶值之際大舉進入，造成嚴重的金融危機。

1997年東協國家貨幣均大幅度貶值時，人民幣在中國政府的管控下維持1美元兌換8.28元人民幣(黃安年, 2006)。1998年6月7日至12日，日圓匯價突破140日圓兌換1美元貶到146.43日圓兌換1美元，日圓貶值對中國、東協國家皆具有重大影響，中國官方三次公開促請日本及其他西方大國維持日圓穩定，日圓貶值對中國最大壓力在於對外貿易，也影響中國的經濟成長。

1998年3月18日新任總理的朱鎔基表示：使人民幣不貶值列入一個確保，就是東南亞當前的經濟危機使中國面臨著挑戰，必須確保中國1998年經濟發展達到

8%成長，通貨膨脹小於3% 人民幣不能貶值（陸委會，1998）。中國必須要做到這些確保，這不僅關係著中國的經濟發展，也關係著亞洲的繁榮與穩定。1998年5月17日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表示：中國並不擔心來自東南亞國家的出口競爭，雖然這些國家由於金融危機中貨幣貶值而提高了出口競爭力，但是中國在1998年第一季貿易數字顯示，並未對中國的出口能力產生很大影響，並重申人民幣不貶值的保證，同時表示為維持人民幣穩定必須付出一定代價，但是中國仍能保持貨幣穩定。東協國家的貨幣因1997年金融危機而發生貨幣貶值，至1998年中國之貨幣仍維持穩定情況下，東協與中國的對外貿易出口影響相比較：

（一）兩者出口結構中國以工業製成品為主，與東協國家之初級產品相近者僅佔11.2%，而東協國家卻佔30%以上。

（二）工業製品中有關紡織品，因中國與東協國家皆以美國為輸出國家，確因受美國輸出配額非關稅貿易之限制，並無影響。

（三）貨幣貶值對東協國家有利亦有弊，係因東協國家除新加坡外尚無種類齊全的工業體系，其工業製成品中進口含量偏高，貨幣貶值表示進口品須付出較多成本購買，生產成本出口價格將提高不利國際貿易。

（四）東協國家的外債皆是短期性，貨幣大幅貶值，相對支付債務金額增加，不利企業資金運轉，增加企業成本負擔，迫使企業倒閉，增加國內失業人口，貶值亦削弱了企業競爭力，而中國並不受其影響（顏奇坪，2002：82）。

亞洲金融危機為東亞各國帶來劇烈的貨幣貶值、惡性通貨膨脹、大量失業等嚴重社會問題；而亞太主義者所主張的經貿投資自由化、便捷化，甚至被認為是導致該危機的罪魁禍首。另一方面，亞太主義國家又拒絕多種被認為有助亞洲各國

化解金融危機困境的方案，包括馬尼拉架構與亞洲貨幣基金會的構想；亞洲金融危機因而引爆APEC 中海洋國家與國家之間激烈的路線之爭，以致於使APEC 逐漸淡化經貿投資的自由化，而須更加強調貧窮、數位落差、婦女、青年及能力建構等經濟技術合作上的議題（蕭全政，2004：11）。

東協國家在遭受到東亞金融危機的衝擊後，仍然無法在美國勢力的反對下，成立區域性的金融援助機制 AMF，這不僅顯示出美國的霸權領導地位不容挑戰，也顯示在當時，在東亞區域內部任何要排除美國勢力的倡議都難以成形（吳德鳳，2000：172），而中國則在這一波的金融援助裡，透過鉅額資金援助、堅持人民幣不貶值，以及維持經濟成長率達 8% 等政策，以成功獲得東協國家的讚譽。儘管中國堅持人民幣不貶值是出於自利考量，即確保以貸款與投資為形式的外來資源來穩固龐大出口部門的經濟動態、幫助港幣幣值的穩定以承擔初回歸的香港之母國責任，還有支撐龐大的國營企業與銀行體系的不良體質等（蕭全政，1998：10）同時，中國又在金融危機爆發後，捐助 10 億美金參與 IMF 對泰國的貸款；同年 12 月，在東協三十週年的非正式高峰會中，中國又進一步承諾人民幣不貶值，並且提供 40 億至 60 億美金參與 IMF 的紓困計劃（吳德鳳，2000：177）。同時，中國也在此高峰會中和東協國家簽署名為「面對二十一世紀的中國—東協合作」的聯合聲明。中國也因此被認為是亞洲的國家主義或民族主義的捍衛者，而且幾乎可以認定是東亞金融危機中的最大獲利者（蕭全政，1998：9）

此外，中國在外交上頻頻出擊，積極參與國際事務，尤其是與周邊國家建立友好關係，目的無非是深怕在「多極」的國際政經秩序格局中，喪失區域權力與利益的優勢。就中國的區域外交戰略而論，主動拉攏東協國家、積極參與東南亞事務、建立雙邊實質經貿關係，鞏固雙邊友好合作夥伴關係，將是中國走向區域霸權的第一步，也是其區域外交的後盾（吳德鳳，2000：178）。在東亞金融危機中，我們得以看到中國自改革開放以後所推動的睦鄰外交已達成初步的成功，不

僅與東協的關係大幅改善，將「中國威脅論」的疑慮暫時降低許多，更增加了中國在東亞區域的影響力。另外中國在金融危機中所維持經濟的穩定與成長，更是贏得歐盟各國與美國的興趣，而極思改善相互間的關係；但是，以美國而言，與中國所建立的「建設性戰略夥伴關係」並不同於「戰略伙伴關係」，彼此間的互動與交往仍須受到美國的亞太戰略及區域內海陸爭霸的基本格局所制約（蕭全政，1998：11）

第二節 東亞主義的發展與「東協+N」體系的擴張

1997年，中國與東協領導人非正式會晤在馬來西亞舉行，雙方發表了聯合聲明，提出建立面向21世紀的睦鄰互信夥伴關係（Forging Closer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2000年11月，朱鎔基出席「東協-中國高峰會議」時，提出要與東協合組自由貿易區的建議，當時雖然引起各界關注，但由於東協國家尚未達成共識，因此並未落實該建議，但是東協成立了「東協-中國經濟貿易合作聯合委員會」負責研究該構想之可行性。隔年，東協與中國雙方又進一步在聯委會的架構下成立「東協-中國經濟合作專家小組」（ASEAN-China Experts Group on Economic Cooperation），由該小組針對加強雙方貿易和投資等經濟聯繫問題規劃可行方案。中國與東協合組自由貿易區的構想在2001年9月在河內舉行的東協第三十三屆經濟部長會議中再度被提出討論，會中東協各國根據「東協-中國經濟合作專家小組」所提出的報告案，通過成立「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該決議後來在同年11月東協汶萊高峰會上中獲得通過，雙方並計畫在10年完成該項計畫。至此，東協和中國合組自由貿易區之議於是確立，此即所謂的「東協加一」（Wong and Chan：2003：507-508）。

近年來，中國與東協之間的貿易關係獲得較迅速的發展。2000年，雙方貿易額達395億美元，東協在中國的商品貿易市場上的份額提高至6.3%，為中國的第五大貿易夥伴，中國在東協的對外貿易中的份額提高至3.9%，為東協的第六大貿易夥伴，儘管如此，雙方經貿關係仍有發展的潛力。

中國和東協共有17億人口，目前國內生產總值為兩兆美元，對外貿易額1.7兆美元。如果在中國與東協之間建立自由貿易區，可以使東協向中國的投資增加48%，東協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9%；而中國向東協的出口增加55%，使中國的國內生產總值增加0.2%（石廣生，2002）。事實上，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不僅可以增加區內貿易，而且會促進外資對區內的投資以及區內本身的投資，就發展區內的角度而言，中國對東協國家的投資會急遽增加。

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將以參考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方式建立。有了東協自由貿易區建設的經驗，顧及中共在2005年完成對加入世貿組織的市場開放承諾，以10年的時間在中國和東協之間進行自由貿易區建設的安排。10年是一個進程，而非開始的時間原點，換言之，在10年期間要完成所有關稅和非關稅的削減，其中絕大部分專案似乎不需花費10年（吳福成，2002：47-53）。

2002年11月4日，中國國務院總理朱鎔基和東協10國領導人在出席東協與中國領導人會議後簽署了「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框架協定」（Framework Agreement on Comprehensive Economic Cooperation Between the Association of South East Asian Nation and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決定到2010年建成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框架協定」係中國與東協全面經濟合作的里程碑，意味中國與東協的經貿合作進入嶄新的階段。框架協定是未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法律基礎，共有16項條款，規定了自由貿易區的目標、範圍、措施、起止時間，先期實現自由貿易的「早期收穫方案」（Early Harvest Program），經濟技術合作

安排，給予越南、寮國、柬埔寨三個非世界貿易組織成員以多邊最惠國待遇的承諾以及在貨物、服務和投資等領域的未來談判安排等內容（經濟部國貿局，2003），總體確定了「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的基本架構。

根據協定，中國與東協自由貿易區將包括貨物貿易、服務貿易、投資和經濟合作等內容。其中貨物貿易是自由貿易區的核心內容，除涉及國家安全以及少數敏感產品外，其它全部產品的關稅和貿易限制措施都應逐步取消。關於貨物貿易的談判將從2003年初開始，2004年6月30日前結束。同時，服務貿易和投資也將逐步實現自由化，關於服務貿易和投資的談判將從2003年開始。在經濟合作方面，雙方商定將以農業、資訊通訊技術、人力資源開發、投資促進和湄公河流域開發為重點，並逐步向其他領域拓展。協定還對未來自由貿易區涉及的貿易規則，如原產地規則、爭端解決機制等內容做出原則的規定（吳竹君，2002：54-59）。

東協和中國、日本和南韓三國之間的經濟合作始於亞洲金融風暴之後。日本政府於1998年給予南韓和泰國貨幣換匯協助，又與泰國、南韓、菲律賓和馬來西亞簽署相互融通外匯的「貨幣換匯協定」。此外，1998年底東協非正式領袖會議上，東協決定與中、日、韓進行經濟、區域發展、貨幣和金融、社會和人類資源發展、文化和資訊、政治安全等多項領域的合作。這兩個動作開啓東亞經濟合作的新頁。

1999年1月，第三屆東協非正式高峰會議在菲律賓馬尼拉召開時，東協和應邀與會的中、日、韓三國元首在會後發表共同聯合公報（稱為「東協加三」聯合宣言），明示十三國同意在六個經濟領域進行合作。對外的合作方面，由於亞洲金融風暴使得東協瞭解其與東北亞的命運與共，於是東協（Association of Asian Nations, ASEAN）轉折性地提出並推動東亞區域主義（East Asian regionalism）的發展，急於加強與東北亞國家的關係，主動將自身當作是東亞的一部份，而不再

如同以往突出東協的特殊性。典型的表現是在東協的促進下，東協十國加東北三國（中、日、韓）的領導人每年定期開會，簡稱「10+3會議」，討論東亞的經濟合作。

1999年於馬尼拉的「10+3」會議是一次重要的里程碑，該次會議發表「東亞合作聯合聲明」（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作為經濟與政治意義的「東亞」概念首次被明確訴求，「10+3會議」更被稱為「東協加3」。馬尼拉會議後，東亞13國的合作始見行動。2000年5月與10月，泰國北部城市清邁分別召開「10+3會議」經濟部長與貿易部長會議，其中5月清邁會議的中心是探討建立東亞地區的補充性融資安排（Supplementary Regional Financing Arrangement），以對付未來可能再次發生的金融危機。東協國家需要利用中國（含香港）與日本豐厚的外匯儲備，東協還需要中國對日本主導的「亞洲貨幣基金」（Asian Monetary Fund, AMF）性質的「東亞貨幣互換機制」的支持；東協自覺在全球經濟體系中的聲音太微弱，需要聯合東北亞的力量增強對全球事務的發言權。原有的東協與東北亞三國之間只存在雙邊框架或者在亞太經合會（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APEC）中的聯繫，如果將該聯繫提升為東協加中日韓，東協就可以在制度上確保東北亞三國成為自己一個依靠。「清邁金融安排」的名稱為「貨幣互換協定」（Currency Swap Arrangement）的擴大。原來，作為一種早期金融預警制度以及支持經濟復甦的信心，東協已經建立起由其秘書處執行的監控機制，以應有關國家國際收支問題的需要，其中亞洲開發銀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 ADB）給予大力的支持。但很明顯，東協自身的實力有限，擔心危機如果再次襲來，如此機制其實效果有限。

東協深知以往的貨幣互換協定不過徒有其名，所以決議採取進一步所謂的「區域措施」（Regional Measures）以使該協定有效，此即中日韓三國拉進來，以東亞的名義實行的經濟合作。經濟合作係指東協與東北亞三國的合作，其每年

的「東協加3」高峰會（國家或政府領袖出席）與各類部長會議都是在東協的高峰會、部長會議召開完後接著舉行，類似於東協區域論壇（ASEAN Regional Forum, ARF），實際上是東協的最高擴大會議，即東協高峰會後將東北亞三國領導人召集來，以東協為一方，東北亞三國為一方（實際上是三方）舉行所謂「10+3」以及個別的「10+1」會議。

在 97 亞洲金融危機之後，有論者認為造成金融危機的原因之一是短期銀行貸款以及短期外匯（美金）貸款。因此開始推動東亞債券市場的擴大。金融危機之後國際金融基金的作為，同樣也讓東協國家感到不安，因此希望能夠成立以亞洲為核心，能夠符合亞洲經濟體質的金融基金。日本於是提出了亞洲金融基金的提案，但是遭到美國的否決。但是對改善亞洲金融體制的需求仍在。在東協與東北亞國家終於以東協加三得以成功整合後，整個東亞金融的改革與整合於焉開始。


東協加三對集體金融機制的協議得到的共識有如成立緊急流動資產措施、清邁協議（Chiang Mai Initiative）的簽定、區域債券的發展，尤其是東協+3 的亞洲債券市場協議（Asian Bond Market Initiative）、對貨幣的管理與區域貨幣的穩定，但距離亞元的發行則還沒有成熟。清邁協議於 2000 年在東協加三的會議上提出，並且於 2003 年底正式通過。清邁協議主要著重在雙邊貨幣互換協議的網絡建立，讓有陷入金融危機的國家得以借貸對方國家的存底來協助自己的外匯存底。

在 1997 的金融危機中，東亞國家的存款人投資大量的存款在外匯上。然後他們又把這些外匯存款以短期借貸的方式貸回自己國家，並把這些錢投資在國內的貨幣上，本國貨幣的極速貶值讓借款人無力償還債務，這又加重幣值的貶抑。因此讓本國貨幣有更多更好的投資機會，這也可以避免金融危機的再現。

雖然亞洲債券市場協議常被視為是建立一個整合的區域市場，但其實可能國內

債券市場的發展更是真正這些國家簽署協議的原因。東協國家的經濟規模雖然不小，但是金融機構與銀行仍無法單獨提供具國際競爭力的金融商品，因此整合亞洲債券成爲東協來彌補個別國家不足的方法。尤其是在東協與中國、日本、南韓整合爲東協加三之後，經濟體的規模都不是過去的東協可比擬的。東協加三在對東亞的金融整合上的努力也許可以達到一定的效果，讓外資有更高的投資意願。但是，中國經濟規模的擴大，在債券市場與金融商品上的成長也有可能比東協更快，這讓中國與東協又會陷入「競爭性大於互補性」的矛盾之中。

第三節 中國崛起及與東協的整合



在後金融危機與對東亞多層面整合過後的中國，已不再是冷戰初期的吳下阿蒙。中國在與東協國家進行其「中三角」層次的外交與整合時，從沒有鬆懈其在國際社會上的大國外交。中國的經濟高成長與國力的擴張，讓中國分別得以在2008年在北京主辦奧林匹克運動會，以及2010年在上海舉辦世界博覽會。這都呈現出中國已然崛起爲世界大國的趨勢。而對東協國家的整合在中國的努力下，也逐漸成爲中國的影響範圍之內（sphere of influence）。

東協和中國持續加強相互支持與合作，中國支持東協「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的宗旨和精神，及簽署東南亞無核區條約作爲回應，東協國家支持中國進入WTO，東協和中國雙邊市場准入談判成功結束，制定「南海區域行爲準則」亦有進程。經貿、政治、區域安全領域之合作更爲深化，雙方在第三次經濟貿易聯合委員會的共同聲明指出，支持中國進入WTO，增進東協和中國的經濟合作和整合，朝向建立東協－中國自由貿易區。同時東協成員寮國、緬甸、泰國和中國於2000年4月20日簽訂「瀾滄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協定」，開啓瀾滄江－湄公河

航運走向國際化，促進湄公河流域的經貿發展，推動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合作，增進中國和東協的一體化（李平，2000：73-75）。

中國與湄公河次區域國家的貿易在亞洲金融危機後逐漸恢復增長，2000年中國與次區域五國貿易額累計近百億美元。2000年4月20日，寮國、緬甸、泰國和中國簽訂「瀾滄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協定」；隨後又簽署有關諒解備忘錄，開啓瀾滄江－湄公河航運走向國際化，促進湄公河流域的經貿發展，推動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的合作，增進中國和東協的一體化，2001年4國已實現正式通航。2002年11月3日，大湄公河次區域領導人會議首次在金邊舉行，成員包括湄公河沿岸之中國、寮國、緬甸、泰國、柬埔寨和越南六個國家的經濟合作受到國際社會的廣泛的關注與參與，已經成爲中國與東南亞地區開展經濟合作的重要組成部分（吳少玲，2005）。

大體上來說，中國對外是採取兩手策略，一方面自1989年以來，以「大國外交戰略」，積極與美、俄、英、法，以及其他區域性大國建立戰略性的夥伴關係，以「韜光養晦」的作法持續改善和各大國之間的關係以發展自身大國的地位，並在其間謀取經貿發展的利益；而在另一方面，則是採取「睦鄰外交」，與週邊的國家建立友好關係，企圖營造一個和平、穩定的週邊環境，中國不斷強調「只會做睦鄰、安鄰、富鄰的事」。

2003年底與東協各國簽署「南海行爲準則」平息南海主權爭議是一個具體的例子，增進東亞各國對中國大陸的信任，爭取區域的主導優勢，採取「有所作爲」的策略以尋求穩定周邊環境和抗衡美、日兩國在亞太地區的勢力（丁樹範，2004），尤其「十加一(中國)」的倡議即是排除日、韓兩國，以取得東亞自由貿易談判的主導地位，利用經貿手段來達到政治目的，進而與日本爭奪亞洲區域經濟整合的霸權地位，提高其在全球的發言權。

另外，以經濟的改革開放成功為崛起鋪路中國，在經濟發展上也在近年出現一些不同的需求。中國的經濟發展的快速成長，讓中國連帶地對能源的需求量也大增。並且，中國也需要更穩定的邊界來確保進口的能源運輸線的安全。中國2005年的石油需求約為每天650萬桶，而進口石油為每天近270萬桶，這個數字比前一年增長了13%。到2020年，中國的石油需求量大約將增至每天1千到1千5百萬桶。

從這個角度來看，東協之於中國就有了不同的意義。東協國家同時包含了中國對南海洋與路地的運輸線。麻六角海峽雖然目前極為重要，但是南海繞到麻六角海峽並進入印度洋的路程中，中國要面臨包括日本、臺灣、南海群島圈等爭議性極大且帶有不穩定因子的場域。也因此，中國積極投入對印支半島地區的次區域層次的建設與投資就得以看出了更核心的意義。中國投入「泛亞鐵路計劃」，並幫助泰國與柬埔寨作鐵路連結，這將方便東協將物資運進中國西部。更重要的是，有了這條鐵路貫穿印支半島，中國將可以直接與迅速地進入印度洋，這給予中國確保重要能源管道安全的能力。這條泛亞鐵路不僅連接了東協國家，使中國西部地區出海運輸距離縮短五千公里，確保了能源通道，往西更可與中亞連結，進一步伸向歐洲。

也因為能源之故，中國在非洲的外交更是積極，中國在非洲大量投資並為許多非洲國家提供援助，尤其是那些擁有能源資源的國家。目前，中國是安哥拉石油的一個主要進口國，而且中國7%的石油來自蘇丹。

亞洲各國也看出了中國在亞洲的企圖，因此日本、韓國、俄羅斯、印度、紐西蘭、澳洲、美國，紛紛尋求與東協的 FTA 談判。日本另也提出協助柬埔寨其境內鐵路。連印度也尋求與東協建立夥伴關係，並建築從新德里至這條泛亞鐵路的平行公路。但近年來值得注意的另一個現象就是東協國家似開始對東協整合的

進程感到不耐，轉而投入雙邊 FTA 的簽定以達成個別國家的經貿發展。

第四節 小結

總體而論，中國與東協在 1997 年東亞金融危機之後出現極大的突破。東協國家基於自身發展模式與策略的緣故，東協國家過份依靠外資，甚至仰賴外資以支撐其經濟成長，並且也對外資缺乏合理的調節，因此在金融危機中吃盡了苦頭。而中國雖然出於自利而保持人民幣值，不論動機為何，以結果論來看，在東亞金融危機中，中國之於東協可以說是樹立起區域大國的形象。並且也因為如此，讓東協與中國之間的整合迅速升溫，「東協+N」的體系儼然成為亞洲區域的核心組織。但也因為這樣，東協也在這個階段正式失去在東亞的主導地位，90 年代初期的風光不再，現今似乎在中國崛起的態勢下，東協已經逐漸退居為配角。

第五章 結論與展望

從二戰結束後到今日，東亞出現了革命性的轉變，整個區域秩序與體系從因冷戰而產生結構化的穩定以及趨近於靜態的互動中逐漸鬆綁。從美蘇兩方勢力幾乎決定整個東亞的命運，到大國勢力的退出與區域國家試圖重整與崛起的過程。先是蘇聯與中國所掌握的大陸東亞，與美國與日本所掌握的海洋東亞的互不侵犯，但互別苗頭，進而轉變成現今東亞似乎逐漸擁有自我整合的態勢。在這個結構限制下，我們也看到個別國家試圖突破結構，展現能動性的努力。

中國首先以國家生存與安全為考量，對東南亞的政策取向以邊境安全為最優先的衡量因素，雖然歷經國內領導人意識形態的不同而在手段上有所不同，有較為強硬與主戰的取向，比如韓戰的參與、中越戰爭的爆發、臺海數度的軍事對峙危機等，也有較為和平與傾向爭議擱置的取向，比如對印度支那保持不直接干涉的政策。

本章首先將提出自冷戰後中國對東協整合的策略趨勢的整體分析。中國對東協整合的原則是以生存為主，發展為輔。另外，中國在對東協國家的策略上則是先面對週邊的大陸東南亞國家，再循序漸進地將勢力推向海洋東南亞國家。在中國與東協的整合過程中，中國為消除「中國威脅論」的壓力，不斷地釋出善意與利多，希望以此獲得東協國家的信任以及增強東協與中國整合的意願。然而，對於中國來說，與東協的整合所獲得的利益並不是首要目的，而是中國希望以此在東亞取得主導地位，甚至以此開拓國際空間。第二，本章將總結東協在面對與中國整合的立場，由於東協從成立以來即在大國勢力角力的陰影下，這導致東協國家無時無刻地遊走在各勢力之間尋求支點的平衡，並且藉由與中國整合的動作，換取美國與日本等其他國家的積極回應。但整體而言，由於個別國家間簽訂雙邊貿易協定的趨勢，東協國家在東協的架構下個別的能動性增強，相對來說，東協

的統合力也就漸降低。本文最後亦將提出臺灣的因應之道，筆者認為臺灣應該更有彈性地處理對外關係，且應當更為謹慎地在美日中等大國勢力之間的盤旋，不能只是僵硬地堅守某個立場，而是以臺灣整體利益作優先考量。除此之外，也要積極與區域內其他國家結盟，以及採取多元的次軌外交的策略，善用本身對東南亞的聯結以締造出最大的外交經貿空間。

中國的整體觀察

整體來說，中國的區域外交政策呈現一條明顯的軸線，不論是毛澤東時代的「一面倒」，亦或是鄧小平時代的「韜光養晦」，雖然有方法與手段上的差異，但總歸地說，中國的區域外交政策是以生存為先，發展為後的實用主義思想作為基礎。一般被認為意識形態以及鬥爭思想極重的毛澤東，在延安時期也曾與國民黨妥協合作，另外，在對蘇關係上也曾有先低頭以求穩固北方邊界的前例，我們可以以此看出，就算是被認為堅守共產主義價值的毛澤東，在面對國家的生存與發展時仍必須以現實為重。

在哪一個歷史時刻中國是以追求生存的目的來配合發展，在哪一個時刻又是追求發展來配合生存，必須視各時期不同的國際與區域政經局勢而論。1990年代初期冷戰剛結束，新中國剛建立不到五十年，國家內部政權尚不穩固，國際局勢又被分為美蘇兩陣營，迫使中國採取迂迴的對蘇友好政策，但一旦蘇聯踩了對中國來說不得踩的紅線而爆發「珍寶島事件」，中國也毫不猶豫地以國家利益為優先，斷然對蘇批判，並且同時爭取對美關係的和緩。與此同時，中國對東南亞關係上採取先求邊界穩定以圖生存的策略，因此對緬甸甚至整個印度支那半島當地毛派的支援請求都不直接回應，並且承諾不會將共產主義輸出到印支半島。另一方面，中國仍然默許在海洋東南亞國家內的左派游擊隊行動。這個對中間地帶

國家的邊境防護的展現。對於中國來說，在印尼與馬來西亞的左派游擊隊不見得可以成功奪取當地政權，但適度地擾亂可以阻止美國勢力透過東南亞滲入中國本土，可以說是當代所說的「決戰境外」的概念。

從 80 年代起，中國對東南亞開始採取睦鄰政策，此一時期，中美關係出現和緩的局勢，中國對東南亞的態度也隨之改變，中國不再擔心美國勢力會直接透過事介入東南亞而對中國產生影響，並且，對於中國來說，東南亞國家因地緣因素使的中國需要與其友好，以鞏固中國在東亞的「後院」，因此睦鄰政策被大力推行。我們可以看出中國對未來以大國崛起的姿態來面對世界的想望與野心。

以美國為例，美國國家發展可以長期不受到國家生存與國土安全的威脅所影響，除了美國對太平洋國家與大西洋國家的各種單邊與多邊的軍事合作、安全協定以外，不能忽略了美國於更早以前就先處理好美國的後院，也就是拉丁美洲。美國需要拉丁美洲在政治與經濟方面對美國無法產生任何程度的威脅，才有辦法超越生存階段，而前進到對外發展的霸權之路。這個美國與其拉美後院的宰制關係，是否是中國引以為鑑的範例，我們無從得知，但是我們可以確定的是，在區域環境下，雖然中國鄰近週遭的地緣政治遠比美國更複雜，不過東南亞仍然是中國向外發展的重要後院，而東南亞國家也是中國週遭國家中最為分散，最不集中的區域。這一點與拉美的國際關係相當類似。在當代的亞洲地緣政治中，中國分別與蘇聯、印度、日本，甚至是臺灣，都有不同程度的緊張與競爭關係，更突顯出「東南亞後院」的重要性。我們甚至可以說中國也在進行自己版本的另一種「圍堵」形式的政策，企圖先中立化東協國家，後在經貿與安全上將其影響力滲透至這個區域，以此包圍美日的海洋勢力在東亞的據點。

有論者以為中國在對東協關係上，以經貿形式的合作與遵守互不干涉內政、擱置爭議等「東協模式」的作法，是表現出其成為一個國際上負責任的成員的意

願。而中國又與俄羅斯與印度分別以和平理性的方式處理邊界爭議更十足證實其「睦鄰政策」的實踐不只是外交辭令，而是真誠的，是目的性而非手段性的。這是值得國際社會給予肯定的，並且中國在軍事預算上大幅度的成長與現代化，更是一個現代國家所「應得的」(Shambaugh, 2005)。然而，卻也有論者以為，中國一連串的睦鄰、富鄰政策，帶給東協國家的不是絕對的利益，也是一種收編。

再者，儘管東協國家努力在「東協+N」體系中努力建立東協的主體性，它們仍然被區域霸權所主導與影響，東亞的經貿合作機制，不論是關稅、金融或是其他各種自由化的措施，縱使在短期內有利於東協國家的利益，但是在區域建制化的過程中也逐漸讓渡出個別國家與東協整體本身的主導權。並且，東協國家在以日本為首的雁行體制逐漸瓦解以及亞洲金融危機後，並沒有成功進行產業升級，過度依賴外來資金與外來技術的經濟體質，讓東協國家在外資上逐漸由依賴西方的外資轉成依賴來自中國的外資，在技術上又仍需要日本的協助，東協國家在與東亞區域強國整合的過程中更讓自己深陷受制於人的泥沼中。在這個前提下，中國對東亞共同體的主導性在某種程度上可以說是重現了歷史上的朝貢體系，這對東協的未來是相當不利的。我們可以觀察到在中國與東協的整合過程中，中國是處於積極介入的一方，而東協則是消極回應，並且東協時常陷入明明主控權不在己，卻自以為主控權在己的「幻覺」(Delusion)(Martin Jones、Smith, 2006: 44) 中國從戰後至今對東協的一系列友善睦鄰政策，展現出來的不是整體的目的性戰略，而只是手段性的戰術，是海面上的浪花，而非海底裡真正的暗流推進方向。中國事實上是利用了對東協國家的收編，成就了其成為不可違逆的區域霸權。


在中國友善的東亞政策中，對週邊國家從俄羅斯、北韓、印度以至所有的東協國家，中國都一以貫之的以先擱置爭議的作法，讓政治界與學界都一致肯定中國的「和平崛起」時，卻仍然有日本與臺灣這兩個「特例」來反證這個「和平崛起」的中國。然而，唯有偏執的套以理論架構，以絕對正面或絕對負面的角度來

觀察中國的東亞外交政策，才會將異於理論假設的部份事實用「特例」來帶過。在對日關係上，中國雖然是日本最大對外投資國，但在特定問題上，中國不僅毫不友善，還能適度操作唯心民族主義來處理對日關係。比方說 2004 年 8 月在中國舉行的亞洲盃足球賽，日本隊在中國遭到足球暴徒（football mob）的包圍，或者是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在靖國神社的參拜問題等等，中國都展現出其並未遵守「和平」的原則。而在對臺政策方面，中國同樣以僵硬的主權立場對臺灣施加壓力，雖然中國對臺灣不同政黨在強硬逼統的立場有所差異，但是對臺灣海峽沿岸的軍事部署都毫無縮減之實。中國對日本以及臺灣並未採取其所宣稱的「和平崛起」態度，並非中國對東亞政策的特例，反之，是東協國家尚未與中國走到國家利益正面衝突的局面所致。由此可見，現階段中國與數個東協國家在南海上主權爭議的擱置，不見得能成功地轉換成和平對話以解決爭端的機制，反之，這只是將爭議暫時埋藏在各種經貿合作的外衣之下。



從東協的角度來看，與中國的整合過程中，可以看出在區域經濟上尋求合作雖然是整個東協發展的趨勢，但是在與中國在關鍵問題上的立場差異，目前仍以擱置爭議的方式處理。這其中值得注意的是在中國與東協國家的爭端處理上，擁有主控權的是中國，不論是中國主動釋出善意在南海問題上讓步，或是中國在東亞金融危機中主動以控管人民幣不貶值的作為，或是早期收成計劃（early harvest plan），都是東協在被動地接受中國釋出的善意。也就是說，只要中國不主動作出相關的讓步與措施，中國與東協的整合就不能成局。東協在這一系列的整合過程中，展現出來的是不斷設置新的機制來尋回東協主導權的企圖。這可以從東亞區域論壇的設置、東協加三的分別建制，以及東協國家本身與日本或美國試圖簽署的雙邊貿易協定來看出。東協對美國的亞太主義載具、亞太經合會（APEC）

的抗拒也是展現出東協試圖走出自己的路。然而，東協所面對的國際情勢以及自身依賴外資的經濟體質，都使東協難以獲得完全的自主。東協與中國在經濟發展的階段上，都處於出口導向的發展模式，以製造業為其出口的主要商品。東協國家與中國目前仍然同樣以歐美西方國家為其主要出口市場，再加上中國本身龐大又低價的勞動力市場，這都讓東協國家的比較利益不比中國。雙方的競爭性在現階段仍然大於互補性。並且，中國在吸引外資的部份對東協產生極大的排擠作用，雖然中國在胡錦濤政府下，有強調國內分配與除弊的趨勢，配合稅制改革與勞動合同的施行，讓中國在過去兩年間開始見證部份外資的出走，而且出走的去處就是屬於東協會員國的越南等地。但是總體來說，中國以其廣大的市場與經濟發展潛力對外資投資者與外商來說，仍然具有強大的吸引力，尤其是中國逐漸在擴大的消費者市場，更讓中國有成為進口大國的態勢。



東協在與中國整合的過程中，因為欠缺自身經濟的轉型，現階段仍然需要來自日本的技術支援才得以發展出口導向的製造業，而金融業更仍然身陷到國際資金主導的桎梏中。因此，東協在 1999 年倡議的東亞自由貿易區，以及更先前的東亞金融基金的倡議，東協國家都是以一直積極參與東南亞經濟發展事務的日本為假想合作與主導對象。日本在 2004 年 7 月加盟「東南亞友好合作條約」後，又與東協達成共識，在 2005 年 4 月開啓「東協—日本全面經濟夥伴關係」(CEP) 的談判，並於 2008 年 4 月完成簽署，與韓國建立「東協—韓國自由貿易區」

(AKFTA) 談判也在 2005 年成立。這諸多措施都展現出東協意圖以多邊貿易協定與建制的方式來撐起自身經貿實力相對不足的狀況，以建立一個較為平衡的經貿網絡來避免過度傾向一方。現階段，天秤上較重的那一方自然是崛起的中國。

在安全方面，東協卻仍無法斷然拒絕美國的勢力。東協內部會員國各自均與美國簽定協防條約，並且在東協國家中最積極，在對中投資上也是最大宗的新加坡，也不免提出對美國勢力仍為東亞區域的平衡力量的觀察。不僅如此，海洋東

協國家的菲律賓、馬來西亞，都仍對美國極為友善，也需要美國的軍事力量作為區域安全平衡的支點。東協國家內部彼此的主權紛爭與各種文化、種族、宗教的差異，隨著 2001 年後的反恐戰爭，接續擴大中，而美國也利用了這樣的機會將其勢力再度重回東南亞舞臺。現階段，東協國家間，與各國國內的差異問題，尚沒有其他大國勢力得以取代美國的仲裁者地位。另外，大陸東協國家也還存有許多問題，包括緬甸的軍政府仍然極度親中的立場，這讓東協國家在緬甸軍政府的違反人道行為一直無法被有效處理。「東協模式」的不干涉內政立場，讓東協在緬甸問題上採取消極的態度。雖然其中有東協需要緬甸作為與中國折衝的考量，但是總歸來說，這也顯示出海洋東協國家與大陸東協國家的基本差異。可以說，不論東協如何努力營造出東協獨立自主的主體性，在安全議題上，東協仍舊沒有走出海陸爭霸的基本結構。大陸東協國家除了泰國與越南有其自身考量以外，緬甸、寮國與柬埔寨，可說在來不及「東協化」以前就已經先「中國化」。同時，另一個新起的趨勢是東協對其會員國似乎沒有成功達成自身經貿平臺的期許，許多會員國分別與其他國家簽定在東協架構以外的雙邊貿易協定，比如日本分別與新加坡、馬來西亞、菲律賓與泰國在 2002 年、2005 年、2006 年與 2007 年簽署自由貿易協定；新加坡與美國、澳洲和韓國也分別簽署完成雙邊自由貿易協定等。這是否意味著東協的機制不足以滿足東協國家各別的經貿需求，也值得繼續追蹤觀察。

臺灣的因應策略

面對東亞區域整合的趨勢下，縱使不能以被「圍堵」之名來說明臺灣在東亞的地位，也可以說已有被「圍堵」之實了。臺灣位於東北亞與東南亞之交，在東南亞可以說是在近十年的東亞整合機制中被全然排除在外。除了亞太經合會臺灣仍保有一席之地，其他不論是東協、東協加三與東亞高峰會、東亞區域論壇、甚至是中國所主導的博鰲論壇等，臺灣都很難有參與的機會。但這樣的態勢也在最近出現變化，2008年在臺灣國內總統選舉告一段落後，新政府的一連串親中政策，讓臺灣與中國的對話在沉寂近十年之久後，再度開啓。縱使臺灣過去在對中國的態度上太過於僵化，但是觀照中國自身的經驗，「一面倒」的外交策略是階段性而非目的性的。因此臺灣不僅對中國關係上要展現出一定的開放態度，同時也不能忽略對東協國家，以至對東北亞國家關係的深化。臺灣要打破外交困境，不能只是僵硬地堅守朝向特定勢力靠攏，而是在外交空間上展現出的「彈性」。

中國在外交上的打壓並沒有因為兩岸關係的短暫和緩而休兵。過去臺灣在1998年申請參與在倫敦舉行的亞歐高峰會時，就被中國否決臺灣參與的提案，理由是唯有主權國家得以加入。另外在亞太安全合作會議（CSCAP，Council for Security Cooperation in Asia Pacific）上，也持續被中國所打壓。於90年代初期，臺灣試圖打破外交困局而採取的「南向政策」，又因為中國在同一時間因天安門事件而向南發展而在東南亞與中國短兵相接，在中國傾全國之力在東協國家進行投資與經貿咨商合作的壓力之下，臺灣的南進政策就顯得有氣無力。但是，若以重實過於名，採取彈性的外交策略，臺灣對東協的外交關係也非毫無發展的空間。例如臺灣在民進黨政府期間，即成功地以「觀察員」身份參與於吉隆坡舉行的亞太圓桌會議（APR，Asia Pacific Roundtable），同時，每年也可以與東協參加二軌外交的對談，好比說 ISEAN-Taiwan IIR/ISIS 會議（林若雱，2005：19）

臺灣在 2000 年至 2008 年之間的執政的民進黨政府，在海陸爭霸的格局下，選擇投入了美日的海洋勢力，而在美國的亞太主義與日本的東亞主義之間，臺灣又是偏向以美國的亞太主義為首，盡全力將對亞洲的整合與參與放在亞太經合會中。無奈亞太經合會於近年來，在與東協加三與東亞高峰會的成立後，漸失去其主導性，並且亞太經合會所倡導的「開放性區域主義」精神在實質上並沒有辦法肩負起區域整合所需要的實質經貿利益的重任。這讓臺灣在各層面都遭受到更多的限制與孤立。事實上，過度親美日，或者是過度親中，都無法完整地幫助臺灣拉抬在東亞整合中的的影響力。就連與中國在歷史上紛擾不斷的日本，都能夠從冷戰後一路走來都不讓自身在相關的亞洲區域組織中缺席，這可以作為臺灣過度追求絕對性路線的警惕。同時，從東協的例子來看，我們也看到東協在區域大國中國、日本與美國之間周旋的努力。雖然東協的發展趨勢受制於大國勢力的影響，東協爲了要克服結構的限制，不斷拋出不同的架構與機制來贏取自身在大國勢力浪頭的一定位置，一系列的努力看似非常冗贅也繁瑣，但也是因爲如此，至今東協仍在其中保有自己相對的自主性。東協利用了大國彼此之間的矛盾，在關鍵時刻站在槓桿上借力使力，也成功作出了一番成績。例如，東協在區域發展上需要與中國保持友好，但是在自身經濟產業的發展上，卻仍待先進國家，尤其是來自於日本的技術與投資。因此，東協與中國所簽定的自由貿易區等等相關措施，也都在對日本發出一定的訊息，藉以刺激日本對東協過度消極的態度轉爲積極。在這方面東協也得到了相當程度的成功，讓東協與日本開啓了自由貿易協定的談判，最後成功簽訂。

臺灣仍然可以以追求簽署雙邊貿易協定爲目標來進行經貿外交。在臺灣產業尋求升級的同時，與東協國家並不是沒有在經貿上進一步互補的空間。同時，在臺灣爲數有限的外來居民與移民中，來自東協國家的人口佔相當大的比例，如果能夠有效運用族群，讓臺灣得以更融入東南亞的區域中，這對雙方長期的互動與瞭解絕對是有利的。臺灣有相當多的知美、日、中人士，甚至擁有親美、日、中

情結三國的人士，但卻缺乏親東協或知東協的人士，這方面臺灣佔有相當大的優勢，應該特別審慎重視東協國家。臺灣身處於東亞區域內，相對於中國的睦鄰、親鄰、富鄰外交方針，臺灣尚有不少努力的空間。

同時，同在亞洲區域卻鮮少被重視的紐西蘭與澳大利亞，也是一塊尚未有效開發的外交場域。澳大利亞近年來積極融入亞洲，甚至揚言將成為最懂亞洲的西方國家。縱使這樣的宣言尚有待進一步深化與充實，但顯示了澳大利亞不願在東亞整合的過程中被忽略的焦慮。紐西蘭與澳大利亞於 2005 年的東亞高峰會中成為觀察員。澳大利亞總理陸克文更是在上任後頻頻出訪中國與亞洲各國，近日還提出了新的亞洲安全共同體，以彌補東協或東亞高峰會仍然欠缺的區域安全機制。這個新的倡議雖然尚未得到東協的反應，但是在亞太區域內，臺灣可以在海洋勢力範疇合作與對話的對象，除了美、日以外，尚有也堅守雷同價值的紐澳兩國，臺灣應可嚐試積極回應澳國的倡議。

總體而言，中國與東協於現階段的整合，看似親密，但實質上仍有東協內部鬆散不夠團結的問題、中國自身因為「韜光養晦」的方針而暫時被擱置的與東協國家的諸多爭議，還有美、日勢力在外圍與中圍的影響尚未消退等困難。中國與東協在經濟上競爭性以及主權爭議上的矛盾，也許在短期內不會呈現出來，但若長期來觀察必然會因國家利益的衝突而須處理彼此的矛盾，屆時若尚未建立起區域安全合作機制，海洋東協與大陸東協的矛盾不能解決，整個東亞區域整合的努力不見得可以維持完好。對於臺灣而言，最重要的是能維持與開拓有意義的投入和彈性的參與（meaningful participation/flexible engagement），以「國之利器不可示於人」的適度等距，在海陸爭霸的洪流中，不強求絕對性的陣營參與，以二軌外交推進國際社會，以雙邊貿易機制，甚至在對中談判時提出中國在臺灣參與東亞高峰會上承諾不再予以打壓等方法，都可以緩衝整個東亞區域共同體整合中臺灣遭到邊緣化的衝擊。



參考書目

壹、中文部份

- 文馨，1995，〈對中國威脅論之研析〉，《中共研究》第二十九卷第八期，台北：中共研究，頁 67。
- 王士彙、王國平著，1998，《從東盟到大東盟—東盟三十年發展研究》，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
- 王仁宏，1998，〈從亞洲金融風暴談我國產業發展政策之調適方向〉，《亞太綜合研究院 Asia Pacific Research》(<http://192.192.200.10/87am.html>)。
- 王高成，1995，〈東協與亞太區域安全〉，《問題與研究》，第 34 卷，第 11 期，頁 64。
- 王麗娟，1999，〈淺談中國威脅論及其實質〉，《河北師範大學學報》第二十二卷，第二期，河北：河北師範大學，頁 36。
- 石廣生，2002，《積極參與區域經濟合作，開創我國對外經貿新格局》，新華網—新聞檢索數據庫。
- 方連慶、劉金質、王炳元主編，1999，《戰後國際關係史，1945-1995》，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
- 朱鎔基，2000，第四屆中國—東協領導人會晤演講，2000/11/25，
(<http://www.fmprc.gov.cn/chn/ziliao/wzwt/zgcydyhz/dscdmzrhhy/t25644.htm>)。
- 朱文暉，2003，〈中國與東盟自由貿易區：區內各國的憧憬與感受〉，《中國評論》，頁 64-74。
- 伍貽康，2002 年 9 月 6 日，〈歐盟要當真正一極〉，人民日報
(http://big5.xinhuanet.com/gate/big5/news.xinhuanet.com/zonghe/2002-09/06/content_551938.htm)。
- 行政院研考會，1984，《對東南亞國家貿易之研究》
- 行政院陸委會，1998，《大陸工作簡報》
(<http://www.mac.gov.tw/big5/mlpolicy/mwreport/87/8708/8708.htm>)。
- 宋帕婉，2007，〈發展現狀及存在問題〉《經濟視角》，2007 年第 3 期，吉林：經濟視角雜誌社。
- 宋鎮照，1998a，〈中共與東南亞之政經關係與發展：回顧與前瞻〉，《東亞季刊》，29:1，頁 57-78。
- 宋鎮照，1998b，〈東協國家在亞太政經秩序變遷之挑戰與發展〉，《理論與政策》，12:3，頁 95-111。
- 宋鎮照，1999，《台海兩岸與東南亞：三角政經關係之解析》，台北：五南圖書。

- 宋鎮照，2003，〈解析當前美「中」兩國亞太政策下的東南亞發展策略〉，《展望與探索》1:7，頁12-27。
- 李文志，1996a，〈中國威脅與美國的對策：介入？圍堵？〉，《國家政策雙周刊》129：12-16。
- 李文志，1996b，〈後冷戰時代亞太安全體系發展與台灣戰略的思考〉，收錄於蕭全政等著之《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頁29-90。
- 李文志，1996c，〈中共的亞太戰略：海洋戰略的開展與挑戰〉，收錄於蕭全政等著之《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頁91-154。
- 李文志，1996d，《後冷戰時代美國的亞太戰略：從扇形戰略到新太平洋共同體》，台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博士論文。
- 李文志、蕭文軒，2006年12月，〈泰國推展次區域經濟合作戰略之政經分析〉，《逢甲人文社會學報第13期》，臺中：逢甲大學人文社會學院。
- 李平，2000，〈瀾滄江—湄公河國際航運回顧與展望〉，《亞洲論壇》，第4期，頁73-75。
- 林友順，2006，〈泛亞鐵路打造亞洲黃金走廊〉，《亞洲週刊》，二十卷四十六期。
- 林若雱，2005，〈評析中國於東亞高峰會之角色〉，《臺灣國際研究季刊》，臺北：臺灣國際研究學會。
- 林庭芳，2003，《中共與東協成立自由貿易區之政治經濟分析》，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金榮勇，2000，〈亞洲金融風暴與東亞經濟安全體系之建立〉，《問題與研究》，39(1)：1-13。
- 周恩來，1990，《周恩來外交文選》，北京：中央文獻出版社。
- 周桂銀，2002，〈冷戰時期中國周邊安全環境的特徵與啟示〉，《當代中國史研究》，9(6)：75-87。
- 吳少玲，2005，〈中老緬泰瀾滄江-湄公河商船通航合作概況〉，《中國—東盟博覽會官方網站》，
(http://big5.caexpo.org/gate/big5/www.caexpo.org/gb/news/special/GMS/coporation/t20050123_30935.html)。
- 吳竹君，2002，〈ASEAN 加三動態分析〉，《臺灣經濟研究月刊》，第25卷第7期，頁54-59。
- 吳福成，2002，〈亞洲的新震撼：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5：7，頁47-53。
- 吳德鳳，2000，《東亞金融危機對亞太區域安全影響之政治經濟分析》，國立暨南大學公共行政與政策研究所碩士論文。
- 吳德鳳，2003年12月，〈東亞金融危機下之亞太權力互動〉，《亞太經濟合作評論》，第十一期。
- 莫泰堯、李平，2000，〈大西南聯合參與瀾滄江—湄公河次區域經濟合作的探

- 討》，《雲南大學人文社會科學學報》，26(3): 1-4;11。
- 黃安年，2006，〈1997年東亞金融危機及其世界影響——當代世界六十(1945-2005)經濟卷一〉《學術交流網》
(<http://www.annian.net/show.aspx?id=20440&cid=23>)。
- 陳一誠，2006，《中國南方外交戰略的政治經濟分析，1949-2006》，國立臺灣大學政治學研究所碩士論文
- 陳治萍譯，1992，〈1992年東協南海宣言〉，《東南亞季刊》，1(3)：117-118。
- 陳治萍，1996a，〈東協區域主義與台灣南聯策略之分析〉，收錄於蕭全政等著之《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頁155-220。
- 陳治萍，1996b，〈南海地區情勢變化與台灣因應之道〉，收錄於蕭全政等著之《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頁221-302。
- 陳欣之，1996，〈東協諸國對「中國威脅論」的看法與回應〉，《問題與研究》，第35卷，第11期，頁29-30。
- 陳喬之，〈東亞合作與中國—東盟自由貿易區的建設〉，《東亞區域經濟合作研究》，主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頁74-92。
- 陳雄章、楊慧娟，1998，《戰後東南亞崛起探因》，廣西：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 陳鴻瑜，1992，《東南亞各國的政治與外交政策》，台北：渤海堂。
- 陳鴻瑜，1992a，〈東南亞的區域主義及其面臨之挑戰〉，《東亞季刊》，第二十三卷第一期
- 陳鴻瑜，2001，《東南亞政治論衡（一）、（二）》，台北：翰蘆圖書。
- 陶文釧，1999，《中美關係史1949-1972》，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 賀聖達，2000，〈東盟的發展前景〉，《亞洲論壇》，第2期，頁9-15。
- 經濟部國貿局，2003，《中國與東協於2003年10月6日達成之「中國—東協自由貿易區」關稅減讓計畫之協議對我經貿影響簡析》，
(http://ekm92.trade.gov.tw/BOFT/web/report_detail.jsp?data_base_id=DB009&category_id=CAT560&report_id=12227)
- 張小明，2003，《中國周邊安全環境分析》，北京：中國國際廣播出版社，2003年，頁113。
- 張亞中、孫國祥，1999，《美國的中國政策—圍堵、交往、戰略夥伴》，台北：生智。
- 鄧小平，1993，《鄧小平文選》，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
- 蔡東杰，2007，《東亞區域發展的政治經濟學》，台北：五南圖書。
- 蔡增家，2002，〈一九九七年亞洲金融風暴後日本、東協與中國大陸互動關係的轉變〉，45(4)：75-95
- 蔡增家，2002，〈多邊主義、區域主義與ASEAN體制：從跨層次分析金融風暴後日本與東協關係的轉變〉，《中國大陸研究》，第45卷第4期，頁75-99頁。
- 黎世芬，1962，〈東南亞協會的分析〉，《問題與研究》，第一卷第八期。
- 趙文衡，2002〈東協與中共成立自由貿易區初探〉，《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5:2，

- 頁 103-108。
- 遲愛萍，1999，〈中共第一代領導人對西方國家的外交戰略〉，《黨的文獻》，第 6 期，頁 57。
- 顏奇坪，2002，《東協與中國大陸的經濟關係：整合理論的觀點》，高雄：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碩士論文。
- 簡福飴，1990，〈談和平演變〉，《文匯報》，1990/4/3，第二版。
- 錢剛鐔，1983，《中共外交政策與策略》，台北：黎明文化，頁 1。
- 蘇顯揚，1998，〈日本對東南亞國家投資沿革〉，《日本通產政策動態報導》，11 月號（<http://www.moea.gov.tw/~ecobook/japan/jl11-b1.htm>）。
- 蕭全政，1988，《政治與經濟的整合》，台北：桂冠。
- 蕭全政，1996a，〈後冷戰時代亞太政經變遷中的兩岸關係〉，收錄於蕭全政等著之《劇變中的亞太與兩岸關係》，台北：業強出版社，頁 1-29。
- 蕭全政，1996b，〈亞太地區國際多邊合作典則的最近發展及其限制〉，收錄於田弘茂主編之《後冷戰時期亞太集體安全》，台北：業強出版社。
- 蕭全政，1997，〈組織與制度的政治經濟分析〉，《暨大學報》，1:1，頁 1-16。
- 蕭全政，1999，《東亞金融危機對亞太區域安全的影響》，香港：香港海峽兩岸關係研究中心。
- 蕭全政，2001a，〈東亞「區域主義」的發展與台灣的角色〉，《政治科學論叢》，第 14 期，頁 201-222。
- 蕭全政，2001b，〈全球化下亞太政治經濟發展前景〉，《台灣經濟研究月刊》，24:6，頁 22-28。
- 蕭全政，2003，〈我國參加 APEC 之總體戰略〉。
- 蕭全政，2004，〈論中共的「和平崛起」〉，《政治科學論叢》，臺北：國立臺灣大學政治系，頁 1-30。
- 蕭全政，2007，〈政治與經濟整合的再思〉，收錄於蕭全政等著之《邁向科際整合的政治學研究》，台北：揚智文化。頁 39-55。

貳、英文部分

Amitav Acharya. 1998. "Democratising Southeast Asia: Economic Crisis and Political Change" Murdoch, Australia: Murdoch University Press.

ASEAN Secretariat. 1999. "Joint Statement on East Asia Cooperation,"
<http://www.aseansec.org/5469.htm>

ASEAN Secretariat. 2001a. "Press Statement by the Chairman of the 7th ASEAN Summit and the 5th ASEAN + 3 Summit," <http://www.aseansec.org/5467.htm>

ASEAN Secretariat. 2001b. "Forging Closer ASEAN-China Economic Relations in the Twenty-One Century," a report submitted by ASEAN-CHINA Expert Group on Economic Cooperation, October, <http://www.aseansec.org/4979.htm>

ASEAN Secretariat. 2004a. "ASEAN-CHINA DIALOGUE,"
<http://www.aseansec.org/5874.htm>

Chairmans Statement The First ASEAN Regional Forum, Bangkok, 25 July 1994,
(<http://www.aseansec.org/politics/pol-arf1.htm//>)

Chairman' s Statement The Third ASEAN Regional Forum, Jakarta, 23 July 1996, (<http://www.aseansec.org/politics/pol-arf3.htm>) .

Chairman' s Statement The Fourth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Subang Jaya, 27 July 1997 (<http://www.aseansec.org/politics/pol-arf4.htm>) .

Chairman' s Statement The Fifth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Manila, 27 July 1998, (<http://www.aseansec.org/politics/pol-arf5.htm>) ,

Chairman' s Statement The Sixth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Singapore, 26 July 1999, (<http://www.aseansec.org/politics/pol-arf6.htm>)

Chairman' s Statement The Seventh Meeting of The ASEAN Regional Forum, Bangkok, 27 July 2000, (<http://www.aseansec.org/politics/pol-arf7.htm>) .

- Baker, James. 1991. "America in Asia: Emerging Architecture for a Pacific Community," *Foreign Affairs*, Vol.70, No.5 (Winter 1991/92), pp. 1-18.
- Berstein, Richard and Ross H. Munro.1997.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America," : New York : Random House.
- Bright, Charles and Michael Geyer, 1987. "For a Unified History of the World in the Twentieth Century," *Radical History Review*, 39 ,p.71
- Bhagwati, Jagdish.1991. *The World Trading System at Risk*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tiy Press)
- Boas, Morten., Marianne H. Marchand, and Timothy M. Shaw. 2005.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Regions and Regionalisms*,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 Buszynski, Leszek, 1983. "SEATO: The Failure of An Alliance Strategy" Singapore: Singapore University Press.
- Carpenter, Ted G.. 1998. "From Intervenor of First Resort to Balancer of Last Resort," in Selig Harrison and Clyde Prestowitz, eds., *Asia After the Miracle* (Washington: Brookings Institute Press)
- Dewi Fortuna Anwar. 1994. "Indonesia in ASEAN foreign policy and regionalism". Singapore: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 Djiwandono. J. Soedjati. 1988. 'Regional Security Cooperation: An ASEAN Perspective', in *Pacific Regional Security: The 1985 Pacific Symposium*. Washington, D.C.: National Defense University Press.
- Gilpin, Robert. 2001. *Global Political Economy: Understanding the International Economic Order*,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 Gregor, James A..1989. " In the shadow of giants : the major powers and the security of Southeast Asia." Stanford, Calif. :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 Hay, Colin. 2008 "Political Analysis: A Critical Introduction" (New York: Palgrave

MacMillan)

Hess, Gary R., 1990, "The American Search for Stability in Southeast Asia: The SEATO Structure of Containment" , in Warren I. Cohen and Akira Iriye, eds. , "The Great Power in East Asia: 1953-1960" ,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Hettne, Bjorn.1999 "Globalization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The Second Great Transformation," in Bjorn Hettene, Andras Sapir and Osvaldo Sunkel, eds., Globalism and the new Regionalism (New York: St. Martin Press) ,p.2

Hopf, Ted. 1998 . "The Promise of Constructivis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ternational Security, Summer, p.171-200

Jackson, A. Peter. 1989. Buddhism, "Legitimations and Conflict: The Political Functions of Urban Thai Buddhism" ,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Joint Statement The 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 Ministerial Meeting, Singapore, 29-31 July1990, (<http://www.aseansec.org/view.asp?file=/politics/prape90.htm//>)

Jones, David Martin and M. L. R. Smith. 2006. "ASEAN and East ... Regional Delusion" , Cheltenham, UK: Edward Elgar Publishing.

Keith, Ronald C., 1992, 《周恩來的外交》，汪永紅譯，北京：東方出版社。

Lindlad, J. Thomas.1997. "Foreign Investment in Southeast Asia in Historical Perspective," Asian Economic Journal, Vol. 11, No. 11, pp.61-80.

Mittleman, James H. 2000. "Subregional Responses to Globalization," in James H. Mittleman, ed., The Globalization Syndrome: Transformation and Resistance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Narine, Shaun. 1998 "Institution Theory and Southeast Asia - The Case of ASEAN," World Affairs, Vol. 161, No. 1, pp.33-47

Nathan, Andrew & Ross, Robert. "The Great Wall and the Empty Fortress" , pg. 221, New York: W.W. Norton and Company, 1998.

Naya, Seiji. And Akira Takayama (ed.) 1990.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East and Southeast

Asia, ASEAN Economic Research Unit Institute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
Singapore.

Richard Bernstein and Ross H. Munro . 1997. "The coming conflict with China" New
York : A.A. Knopf. (Ross H.Munroe) 於 1992

Samuel P. Huntington. 1996. "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 and the remaking of world order".
New York : Simon & Schuster.

Shambaugh, David. 2005. "China Engages Asia",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ume 29, Issue
3

Statement by The ASEAN Foreign Ministers on the recent Development in The South
China Sea, 18 Statement By H.E. Datuk Abdullah Haji Ahmad Badawi Mini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Malaysia,
(<http://www.aseansec.org/menu.asp?action=3&content=5>)

Statement by H.E. DATO'SERI Abdullah Bin Haji Ahmad Badawi Minster of Foreign
Affairs of Malaysia at the PMC 9+1 Session With The People' s Republic of China,
28 July 1998, Manila, (<http://www.aseansec.org/menu.asp?action=3&content=5>)

Stubbs,Richard , 2002, " ASEAN PLUS THREE: Emerging East Asian Regionalism" ,
Asian Survey 42:3,pp.440-455

Yahuda, M. 1996 The International Politics of the Asia Pacific, 1945-1995. London:
Routledge.

Wong, John and Sarah Chan. 2003. "China-Asean Free Trade Agreement: Shaping
Future Economic Relations" . Asian Survey, Vol. 43, No. 3 (May - Jun., 2003), pp.
507-526

World Bank. 1993. "The East Asian Miracle." Oxford, U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Yiping Huang and Yongzheng Yang , 1998 , " China' s Financial Fragility and Policy
Response" Asian-Pacific Economic Literature , Vol.12 , No.2 , p.1-2